

論南宋末期文及翁其人、其事及其西湖詞*

林順夫**

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研究學系

摘 要

中國南宋末期作家文及翁的調寄〈賀新郎〉之西湖詞，一直被批評家譽為是「千古傳誦」的好詞，然而學界對此詞的論述卻並非詳盡。本文旨在填補這一研究上的空缺，以求對文及翁生平及其西湖詞做一較為全面完整的解讀。本文先從若干筆記史料中所載之文及翁軼事入手，探索了〈賀新郎〉一詞創作及流傳的實際情況。在此基礎上，本文綜合現有資料，對文及翁其人、其事及其學問、著作，進行簡要的論述。論文的第三部分是對〈賀新郎〉一詞的分節細讀，同時也對詞中所用歷史典故及藝術手法加以詳細分析。最後，本文通過對「南宋君臣沉溺湖山歌舞以至亡國」這一主題的形成及傳播歷史的剖析，指出文及翁西湖詞中所透露出的對南宋國事的預見性，以及此詞在南宋詞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意義。

關鍵詞：文及翁西湖詞，南宋衰亡，西湖歌舞，文化批評

* 此文初稿是在「中國文化研究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的。此會由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學系、普林斯頓東亞研究學系，以及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合辦，於2006年11月19至21日三天在臺灣中壢舉行。在研討會上，拙稿是由國立中興大學的王明蓀教授當特約討論。對此，本人感到非常榮幸，因為王教授是研究宋史的專家。王教授對拙稿提出了既深入又仔細的批評與修改意見，也改正了一些錯誤。對於王教授，本人在此致以衷地感謝。由於篇幅太長，無法把論文全部收入紀念先師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先生的論文集子裡。因此，本人乃摘錄論文中解讀〈賀新郎〉詞本身，及與解讀此詞最有關聯的論述，成一較短論文，仍用原來的〈國家衰亡的預感？：讀文及翁的西湖詞〉作題目，收入紀念牟先生的文集裡。該文集的書名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論文集》，已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09年初出版。本人再把完整的論文稿投給《清華學報》，並按照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又將論文酌予修正一次。對審查人，我也非常感謝。根據一審查人的建議，筆者把題目改為〈論南宋末期文及翁其人及其西湖詞〉，較為切題。本文雖經多次修訂，恐怕仍不免有錯誤與不足處，這些當然全部都由筆者自己負責。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lsf@umich.edu。

一、前言

中國學者陶爾夫和劉敬圻兩先生合撰《南宋詞史》，於討論南宋滅亡前夕的作家文及翁時說：

文及翁，南宋末年人，生卒年不詳，字時舉，號本心，綿州（今四川綿陽）人，移居浙江吳興。宋理宗寶祐元年（1253）進士，歷官至簽書樞密院事。理宗景定年間，因論公田事，有名於世。宋亡不仕。有文集二十卷，均已失傳，僅存詞《賀新郎》一首。

據李有《古杭雜記》載，文及翁登第後，參加新進士集會，同遊西湖。有人問他：「西蜀有此景否？」文及翁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即席賦〈賀新郎〉」。此詞一出，便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

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石盡，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礪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註1）

上引這幾段文字後，陶、劉兩氏提供了三百多字相當精簡的評論。本人尤其欣賞底下兩句頗得這首名篇要領的總評：「這首詞概括了當時的形勢，分析了國家的前途，抒寫了自己的抱負，批評了南宋王朝的黑暗腐敗，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力透紙背。詞人從大處著眼，小處落墨，具有豐富的藝術聯想」。（註2）《南宋詞史》是論述南宋這一階段詞整個發展歷史之不可多得的學術著作。在這種通論性質的書裡，對於一位生平事跡已變得隱晦的七百多年前文人及其被宣稱是唯一傳世的

1. 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416-417。（此處文及翁小傳裡，「字時舉」可能是根據《湖州府志》所載文及翁小傳而來的。本人所見資料都作「字時舉」。《湖州府志》文氏小傳錄於陸心源，《宋史翼》（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34，頁1480。《南宋詞史》是用簡體字出版的。本人引文時，則將簡體字改成繁體字，並把引號換成臺灣習用者。此外，對於詞之標點，為表現其韻拍結構起見，也不遵循陶劉兩氏的標法。特此聲明。

2. 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頁417。

作品，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作者提出詳細之析論。不過，本人認為，一向被指定是文及翁所作的這首〈賀新郎〉，既然是篇「千古傳誦」的好詞，就應該有人給它作較為全面完整的解讀。我所謂全面完整的解讀，應該包括此詞之出現及其以後流傳的實際情況，是否能證實此詞確是文及翁的作品，以及這首傑出的詞在南宋詞史及文化史上究竟有無任何特殊的意義。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還沒人對此詞作過類似這樣能較為令人滿意的解讀。因此，我這篇論文可算是爲了彌補這個南宋詞研究中缺失的一個嘗試。筆者所以敢在此作一大膽嘗試，也是因爲目前《四庫全書》及《古今圖書集成》都已經有電子數據庫（electronic databases）了，可供從事中國古典人文研究工作者，查詢與檢索跟自己研究題目有關的材料。經過在此二大叢書（尤其是《四庫全書》）的電子數據庫查詢後，^{（註3）}我發現今天可以見到的文及翁的著作、以及有關〈賀新郎〉（一勺西湖水）詞和文及翁這個人的資料，還存在一些。更令我感到興奮的是，尚存資料雖然不多，卻大部分頗爲有用，竟還足以顯示出文及翁其人、其事及其學問著作的梗概。現在我就從〈賀新郎〉詞之出現這一問題開始討論。

二、環繞文及翁〈賀新郎〉詞出現的諸多問題

陶爾夫、劉敬圻提到「李有《古杭雜記》」一書，這資料是根據陶宗儀的《說郛》而來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裡，有如下有關《古杭雜記詩集四卷》的《提要》一篇：

不著撰人名氏，皆載宋人小詩之有關事實者，各為詳其本末，如本事詩之例。目錄末有題識云：「已上係宋朝遺事，一新繡梓，求到續集，陸續出售，與好事君子共之」。其書目又別題「一依盧陵正本」六字，蓋元時江西書賈所刊也。所記凡四十九條，多理宗、度宗時嘲笑之詞，不足以資考核。案陶宗儀《說郛》內亦載有是書，題作元李東有撰（「東」字恐係衍文）。然與此本參較，僅首二條相同，餘皆互異，未喻其故。觀書

3. 本人查詢所用的是《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4）以及《古今圖書集成》（臺北：聯合百科電子出版有限公司，2006）。

首標題，殆《古杭雜記》為總名，而《詩集》為子目，乃其全書之一集，非完帙也。(註4)

被收入《四庫全書》的《說郛》，共一百二十卷。依據《提要》的說明，此一百二十卷本的《說郛》，是清朝順治丁亥（1647）年間陶珽所編的，與元末明初的陶宗儀原來編撰的一百卷本，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註5)在考證陶宗儀的原編時，《提要》又說：「蓋宗儀是書，寔仿曾慥《類說》之例，每書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失亡，而從類書之中鈔合其文，以備一種者。故其體例，與左圭《百川學海》迥殊」。(註6)此評語正可拿來解釋為什麼《說郛》所載的《古杭雜記》與《古杭雜記詩集》有極大的出入。今存的《古杭雜記》總共只有十九條，與包含有四十九條的《古杭雜記詩集》，「僅首二條相同，餘皆互異」。其實，連這首二條也並不是完全一樣。後書每一條都有題目，如首二條題為「一擔擔」和「天目山崩」，而前書則無題目。此外，條中文字本身及其前後順序，也都稍有差異。筆者認為，《提要》所持「《古杭雜記》為總名，而《詩集》為子目」的看法，是很合理的。其次，既然《古杭雜記詩集》目錄末題識有「續集」一語，則「前集」應指前此刊出的《古杭雜記》無疑。而李有究竟是何許人也，現在因為文獻不足，已無可考了。《說郛》所載的《古杭雜記》，也許是根據李有編的一本《古杭雜記》而來，也很可能係陶宗儀從原出的《古杭雜記》與續出的《古杭雜記詩集》，選取十九個項目（而稍加改訂其文字），以「略存」此書的「大概」而成。如果這樣推測基本上沒錯的話，則有關文及翁賦〈賀新郎〉的故事，應該是源自最早出的《古杭雜記》的。

說至此，應該提一提劉一清所編撰的《錢塘遺事》，這是一部元初出現的很重要的書，其中也載有文及翁賦〈賀新郎〉的故事。《提要》全文如下：

《錢塘遺事》十卷，元劉一清撰。一清，臨安人，始末無可考。其書雖以錢塘為名，而實紀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寧四朝，所載頗略，理度以後敘錄最詳。大抵雜采宋人說部而成，故頗與《鶴林玉露》、《齊東野語》、

4.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919。

5.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頁1644。

6.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頁1644。

《古杭雜記》諸書，互相出入。雖時有詳略同異，亦往往錄其原文。如一卷〈十里荷花〉一條，二卷〈辛幼安詞〉一條、〈韓平原〉一條、〈大字成犬〉一條，皆采自《鶴林玉露》。既不著其書名，其中所載，「余謂」、「愚聞」、及「余亦作一篇」云云，皆因羅大經之自稱，不加刊削，遂使隔七、八十年，語如目睹，殊類於「不去葛龔」。^(註7)又書中稱「北兵」、稱「北朝憲宗皇帝」、稱帝□曰「嗣君」、稱謝后曰「太皇太后」，似屬宋人之詞；而復稱元曰「大元」、稱元兵曰「大兵」、曰「大元國兵」、稱元世宗曰「皇帝」、乃全作元人之語。蓋雜采舊文，合為一帙，故內外之詞，不能畫一，亦皆失於改正。然宋末軍國大政，以及賢姦進退，條分縷析，多有正史所不及者。蓋革代之際，目擊僨敗，較傳聞者為悉。故書中大旨，刺賈似道居多。第九卷全錄嚴光大所紀，德祐丙子祈請使行程；第十卷全載南宋科目條格故事，而是書終焉。殆以宋之養士如此周詳，而諸臣自祈請以外，一籌莫效，寓刺士大夫歟。孔齊《至正直記》所列，元朝典文，可為史館之用者，一清是書居其一。世無刊本，傳寫頗稀。陶宗儀《說郛》，僅載數條。此乃舊鈔足本，前後無序跋，惟卷端題識數行：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不署名氏，詳其詞意，亦宋之遺民也。^(註8)

本人認為，這篇《提要》至為精彩，把《錢塘遺事》編撰特出的地方，及其價值，用極精簡的文字，都標列出來。不過，《提要》作者受其傳統視野的局限，只特別注意此書「可為史館之用」的實用價值，而不能對劉一清編撰此書時，在文學方面的創造多所著墨。《錢塘遺事》雖係雜采舊文，編綴成書，其實並不是只「紀南宋一代之事而已」，而是一部聚焦地記述南宋亡國的很獨特而珍貴的記述文學(narrative literature)作品。關於這方面，我留待本文第三部份再作較詳細的論述。在此，我先把劉一清書和〈賀新郎〉詞及其作者可能相關的一些問題拿來討

7. 葛龔是東漢時人。有人請他代撰奏文，那人於抄寫時，竟忘了寫自己名字，而把葛龔名字照抄，然後呈上奏文。當時有人說：「作奏雖工，宜去葛龔」。此典故出自〈葛龔〉，《後漢書》，卷80；及《注》引邯鄲氏，《笑林》。見《辭源》（北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1459。

8. 劉一清，《錢塘遺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3-5。除首尾兩句「臣等謹案」、「乾隆三十九年恭校」外，我把〈提要〉全文引出。

論一下。

在采錄舊文的體例上，《錢塘遺事》和《說郛》有其相同與相異的地方。首先，兩書都從資料來源的書籍裡摘取自己感興趣的條文而遺棄其餘。劉一清和陶宗儀都常把引用的舊文在文字上稍加移動更改，而劉一清有時對所引舊文還作頗大的改動。我們且取兩書同樣采自《古杭雜記詩集》首二條（即〈一擔擔〉和〈天目山崩〉）作例子來比較一下。《說郛》仍以此二條為《古杭雜記》之首，不過把二條之題目去掉，並把原書先詩後文的順序倒過來，文字也稍作更改。劉一清則把〈一擔擔〉移至自己書之卷四去，而把題目〈天目山崩〉改成〈天目山讖〉後，拿來作他全書的開篇。他雖然保留了二條之題目，在文字上卻作了較多的更改，同時又加了些原書沒有的材料。三書裡有關「天目山崩」的全文如下：

1. 天目山崩

天目山崩水嚙磯，天心地脈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宋高宗中興，建都于錢塘，天目乃主龍山。至度宗甲戌（1274），天目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都之議。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此詩，亦有意義。昔郭璞有詩讖云：

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
（《古杭雜記詩集》卷一）（註9）

2.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脈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說郛》卷四十七下，《古杭雜記》）（註10）

3. 天目山讖

臨安都城，其山肇自天目。讖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

9. 《古杭雜記詩集》（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學亞洲圖書館，明鈔本顯微膠片），卷1，無頁數。

10. 《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說郛》，卷47下，無頁數。

海門一點巽山小，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說之著，更其末云「異姓王」以遷就之。高宗駐蹕，其說始驗。仰視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蔥之符。秦檜專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則檜家廟，西則格天閣之故基。檜死，熹猶戀戀，請以弟常州倅烜，為光祿丞，留隸家廟。言者罷，烜並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室焉。高宗倦勤，即其地築宮，曰「德壽」。後又更名曰「重華」、曰「慈福」、曰「壽慈」，凡四易名。至咸淳甲戌，天目山崩，則百年王氣，亦終於此矣。

（《錢塘遺事》卷一第一條）（註11）

上面第二條引文，雖其兩詩之順序與第一條正好相反，而文字也稍有不同，其係出於前條，則應無問題。尤須提出者，此兩條所關注的，是兩首絕句所含藏的「本事」，亦即有關天目山的讖言及風水迷信。第三條就很不一樣了。劉一清不引無名氏所作一詩，把注意力集中在郭璞（276-324）的讖詩上，但卻把詩人名字略去。他把第二句裡「異峰起」三字改為「異山小」，似乎是在強調天目山氣象之小。除改文字外，劉一清又加了一些前兩條所無的細節。

「錢氏」指五代十國中以杭州為首都的吳越王錢鏐（852-932）。《錢塘遺事》卷一第三條〈夢吳越王取故地〉，提及傳說宋高宗（1107-1187）臨生之際，徽宗（1082-1135）曾夢錢鏐孫錢俶（俶繼承其祖作吳越王）來討還其山河，而顯仁皇后初生高宗時也夢見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註12）此一細節似要人聯想到宋高宗，雖不姓錢而是「異姓王」，其實等於是錢王之再世，因此其格局也就不大。條中提到秦檜那一段，很可能是採自岳飛（1103-1142）的孫子岳珂（1183-1240）所撰的《桎史》。《桎史》卷二第一條〈行都南北內〉有下面文字：

……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蔥之符。秦檜顓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於位，熹猶戀戀，

11. 劉一清，《錢塘遺事》，頁17-18。

12. 劉一清，《錢塘遺事》，頁18。

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為光祿丞，留蒞家廟，以為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並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燁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註13）

岳珂的敘述比較詳細。劉一清則只輕描淡寫地點一點秦檜向高宗求賜府第，造格天閣，以及其子熹於檜死後仍戀戀不捨其地，為後文秦檜賣國，和韓侂胄、賈似道之害國預作伏筆。結尾提到高宗於「倦勤」後，在秦檜府第故居築德壽宮。劉一清雖不明說，我們應該指出高宗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禪位給皇太子（即孝宗），開始在德壽宮過他人生最後二十五年的退隱生活。周密（1232-1298）在《武林舊事》裡說：「高宗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乃於〔德壽〕宮內鑿大池，引水注之，以象西湖冷泉；疊石為山，作飛來峰，因取〔蘇東〕坡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名之」。（註14）據此，我們可以清楚了解，高宗藉口「倦勤」而禪位的真正目的，是要享受臨安的湖山勝概，過他安逸閒適的太上皇生活。〈天目山讖〉這一條是緊跟下面這段卷端題識而提出來的：「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于度外。卒至喪師誤主，納土賣國，可為長歎惜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云」。仔細閱讀《錢塘遺事》開篇的題識及正文第一條，我們應能體會出，作者除了責怪高宗選錯了地方建都，也極含蓄地批評他給士大夫立下了沉醉於湖山歌舞的生活典範。

劉一清在此條中對於讖言及風水迷信的態度也值得注意。表面上，他好像是相信讖與風水，因為他也說郭璞的預言到了高宗駐蹕杭州「始驗」，而且也說「至咸淳甲戌，天目山崩，則百年王氣，亦終於此矣」。不過，我們不能忽略劉一清在討論這些迷信時，仔細地創造了一個新的語境（context）。條中特別提到，「紹興間望氣者」以為位處杭州西湖東南的吳山「有鬱蔥之符」。可是，「風水」這麼好的地方，卻被秦檜和高宗拿來作建造私人享樂用的府第、皇宮之地基。卷一第三條題作〈金陵山水〉，係全文取自《古杭雜記詩集》卷二，只在文字上有無關緊要

13. 岳珂，《桎史》，卷2，頁1b，見王雲五，《四部叢刊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14. 周密，《武林舊事》，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中華書局，1962），頁392。

的微異。其條文曰：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暫都金陵之意。末年因幸建康，此意未釋。召一術者決之。術者云：「建康，山雖有餘，水則不足」。獻詩曰：「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得久興。秀氣盡隨流水去，空留煙岫鎖陵嶒」。(註15)

從記敘高宗擇都不智的主題和語境來解讀，顯然有隱含批評他輕信風水家之言的意思。(註16)前面所舉「紹興間望氣者」之說也應作如是觀。因為劉一清在編撰《錢塘遺事》時，有其心所關注的主題，所以就是他大致照抄他書時，其引文也就有了新的意涵。

《錢塘遺事》和《說郛》兩書還有其他相異處。前書完全不著引用書冊的名稱，而後書則一一注明。其次，《說郛》把采自同書的材料聚合在一起，且著其書名，但把各條題目去除，而且所選材料編排之先後順序，看不出依照何種原則；而《錢塘遺事》則把采自同書的材料散佈於不同卷裡，但保存原書各條題目。劉書在采來的材料安排上，有其嚴謹的總體架構，這點留到後文第四部份再討論。這些不同，蓋由兩書編撰之意旨不同所致。陶宗儀編《說郛》的目的只是要保存「說部」裡一些書籍的「大概」，而劉一清則選擇他認為較有意義的條目，來記述、分析南宋之衰亡。陶宗儀編撰的動機，可以說只是保存逸事趣聞，與劉一清之有嚴肅的編書意圖迥異。

《古杭雜記》應該是一部以記錄逸事趣聞為主要目的之書。因為《古杭雜記詩集》裡有很多記載是「理宗度宗時嘲笑之詞，不足以資考核」，所以《提要》作者對此書也就不太重視。不但《古杭雜記詩集》一書沒被收入《四庫全書》，而且在討論劉一清往往從舊書裡「錄其原文」時，《提要》也一個例子都不屑舉，而只從《鶴林玉露》摘取例子。其實，按照本人的考察，劉一清從《古杭雜記》采來的材料，要遠比從《鶴林玉露》采來的多。依據我的統計，《錢塘遺事》與《鶴林玉露》相同或極相似的，一共只有七條，(註17)而與《古杭雜記詩集》相同者，就

15. 劉一清，《錢塘遺事》，頁19。

16.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首七條，從〈天目山讖〉至〈高宗定都〉可說都是在記述高宗選擇杭州作國都這個主題的。

17.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十里荷花〉和卷2〈辛幼安詞〉、〈慶元侍講〉、〈韓平原〉、〈韓平原客〉、〈大字成犬〉、和〈辛卯火〉等七條。

有十五條，^(註 18)而與《說郛》裡的《古杭雜記》相同者，也有八條。^(註 19)前面已經指出，〈一擔擔〉及〈天目山崩〉兩條，均見於《古杭雜記詩集》和《說郛·古杭雜記》。《錢塘遺事》十卷裡，前八卷都是「雜采宋人說部而成」，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條，其中可見於《古杭雜記詩集》和《說郛·古杭雜記》者，去掉重複的首二條不算，就有二十一條之多。如果宋末元初編成的《古杭雜記》今天還存在的話，說不定我們還能發現，劉一清從中采集了更多的材料。無論如何，我們不必懷疑今已失逸的原本《古杭雜記》是《錢塘遺事》所依賴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而出於《錢塘遺事》卷一的文及翁〈賀新郎、遊湖詞〉一條，應該是來自刊行早於《古杭雜記詩集》的《古杭雜記》。而且，載於《錢塘遺事》和《說郛·古杭雜記》兩書裡的文及翁〈賀新郎、遊湖詞〉，除詞文有兩字不同外，完全一致。^(註 20)根據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推測，原本《古杭雜記》是最早記載文及翁與同年遊西湖而賦〈賀新郎〉詞的故事並錄其詞的一部書。

誠如《提要》所論，《古杭雜記詩集》「皆載宋人小詩之有關事實者，各為詳其本末，如本事詩之例」。《本事詩》當然是指唐朝孟棨所著，記述唐人詩背後有關詩人的傳聞逸事之書。孟棨所記是常有附會的傳說的。既然《古杭雜記》是屬於這種性質的書，其所記文及翁賦〈賀新郎〉詞一事，不能不加考察就信以為真。令人遺憾的是，文及翁的二十卷文集久已失傳，而且除了《錢塘遺事》和《說郛·古杭雜記》兩書外，現在尚存的宋末元初書籍和史料裡，我們也找不到有關這件故事的記載。在缺乏所需資料的情況下，本人只好提供一些合理的推測。

首先，載於今已失逸的《古杭雜記》原本裡的〈賀新郎、遊湖詞〉，很可能就是文及翁的詞作。在《古杭雜記詩集》裡，純屬傳聞或不知作者的詩，通常多寫作：「人作是詩」，^(註 21)「無名氏題詩」，^(註 22)「故詩云」，^(註 23)「京師為之語曰」，

18.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天目山識〉、〈金陵山水〉、〈顯慶寺〉、〈射潮箭〉、卷4的〈吳潛入相〉（此條包含了《古杭雜記詩集》，卷3〈扳附〉、〈嚴覆試〉、〈李璫歸國〉、〈一擔擔〉、〈雪詞〉、卷5的〈似道專政〉、〈半閑亭〉、〈排當〉、卷6的〈李璫挂冠〉、〈龍飛賦題〉、〈諒陰三元〉等十五條。

19.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天目山識〉、〈遊湖詞〉、〈三賢堂〉、〈題白塔橋〉、〈淨慈羅漢〉、〈大理寺家祭〉、卷4的〈一擔擔〉、以及卷5的〈排排公田〉等八條。

20. 關於文及翁〈賀新郎〉版本文字有不同這問題，留待後文解讀此詞時再來討論。

21. 〈一擔擔〉，《古杭雜記詩集》，卷1。

22. 〈釣臺〉，《古杭雜記詩集》，卷1。

23. 〈排當〉，《古杭雜記詩集》，卷2。

(註 24)「時人爲之語曰」，(註 25)「時人有詩一聯云」(註 26)等。集中有不少采錄的詩都題有作者的名字。卷一載一首姚勉（約 1219-1264）寫的〈賀新郎〉詞（以「月轉宮牆曲，六更殘鑰魚聲亮」起），而卷二載有文天祥（1236-1283）的七言律詩（以「於皇天子自乘龍」句起）。姚、文兩人與文及翁是同時代的人，而且也都跟文氏相識。姚勉和文及翁同於宋理宗寶祐元年（1253）舉進士，姚勉以狀元而文及翁以榜眼（即第二名）及第。(註 27)文天祥則於寶祐四年（1256）以狀元中舉，當時他才二十一歲。文及翁在 1253 年及第後到江西廬陵（文天祥的家鄉）去拜訪他叔叔文可則，兩人就在那一年結識；等到文天祥進士及第後，兩人就通了譜，認爲是同族的人。(註 28)姚勉、文及翁、文天祥三人應該都是宋末極傑出的人才。姚勉的〈賀新郎〉是他及第後作的詞；而文天祥的七律則是他及第後謝皇帝恩的詩。這兩篇作品都可分別在姚、文二人傳世的文集裡找到。(註 29)《古杭雜記詩集》只載文天祥的謝恩詩，沒有案語。而所錄的姚勉詞後則有跋語曰：

姚勉為狀元，嘗作是詞，用六更事。昔朱（應是「宋」之誤）太祖以庚辛即位，後有五更之說。五更周漸禁中忌打五更鼓，遂作六更。前輩歌詩，間有言六更者。理宗室（應是「寶」之誤）祐癸丑臨軒，勉作大魁，賦此。然則，五更既可加為六更，六更之盡，不可復加與？(註 30)

這條跋語，只著重姚勉避宋太祖「五更」之忌，而用「六更」一詞，似無什麼深意。其實，姚勉自己在詞前加了一短序說：

嘗不喜舊詞。所謂宴罷瓊林，醉遊花市，此時方顯男兒志。以為男兒之志，豈止在醉花市而已哉？此說殊未然也。必志於致君澤民而後可。嘗

24. 〈甲戌諒陰〉，《古杭雜記詩集》，卷 3。

25. 〈度宗龍飛省試〉，《古杭雜記詩集》，卷 3。

26. 〈人心之忿〉，《古杭雜記詩集》，卷 4。

27. 文及翁，〈雪坡集原序〉有如下幾句：「寶祐元年，歲在癸丑，上臨軒賜進士第。予與姚成一（成一為姚勉字），適相後先，聯鑰入期集所」。《雪坡集》是姚勉的文集，由他的從子姚龍起所編，共五十卷，尚存。見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雪坡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1 上。

28. 見文天祥，〈與文侍郎及翁〉信及道體堂的跋。熊飛、漆身起、黃順將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 218。

29. 姚勉，《雪坡集》，〈賀新郎、及第作〉，卷 44，熊飛、漆身起、黃順將校點，《文天祥全集》，頁 3 上-3 下；〈齊英殿賜進士及第恭謝詩〉，《文天祥全集》，卷 1，頁 1。

30. 〈六更鼓〉，《古杭雜記詩集》，卷 1。

欲作數語易之，而未暇。癸丑叨忝誤恩，方圓前話。以為他日魁天下者之勸，非敢自銜也。夫以天子之所親擢，蒼生之所屬望，當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負之哉？（以下數句略）^{（註 31）}

此序批評前人於進士及第後所寫的詩詞，常是歌詠「宴罷瓊林，醉遊花市」的狂歡景況，而他自己的詞則要發抒男兒「致君澤民」之大志。此序寫的頗為正經嚴肅，而詞作本身卻只描寫集英殿唱名之事，也無甚精彩之處。^{（註 32）}有趣的是，《古杭雜記詩集》編撰者把姚勉無甚精彩的〈賀新郎〉詞全文一字不漏照抄，序則隻字不提，卻去著墨於「五更」、「六更」這樣無關緊要的瑣碎事。也許姚勉的序太嚴肅了，沒引起《古杭雜記詩集》編撰者的興趣。無論如何，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所載的詩與詞，確確是姚勉和文天祥各於進士及第後所作的。說不定，《古杭雜記》原集所載的文及翁〈賀新郎、遊湖詞〉真是他於及第後與同年遊西湖時作。雖然這首詞也不是寫「宴罷瓊林，醉遊花市」，而是寫一位有志之士的憂患意識，不過就詞本身而論，它比姚勉的〈賀新郎〉要精彩有趣得多了。當然，也有可能該詞確是文及翁所作，不過並不是在如《古杭雜記》所提的情況下寫出，因此《古杭雜記》所記的「本事」，只是傳聞附會而已。可惜文及翁的文集久已亡佚，我們也找不到其他可信的資料，來供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就目前還能看到的文及翁材料，來探討他是否有可能寫得出那首精彩的〈賀新郎〉。

三、文及翁其人、其事、及其學問著作

雖然在南宋末季，文及翁被當時的人尊稱為「一時名賢」、^{（註 33）}「南北知名士」、^{（註 34）}和「江南耆舊」^{（註 35）}之一，而且他也在中央政府作過官，可是由於一些

31. 姚勉，〈賀新郎、及第作〉，《雪坡集》，卷 44，序，頁 3 上。

32. 姚勉〈賀新郎〉詞全文為：「月轉宮牆曲。六更殘、鑰魚聲亮，紛紛袍鶴。黻座臨軒清蹕奏，天仗綴行森肅。望五色、雲浮黃屋。三策忠嘉親賜擢，動龍顏、人立班頭玉。臚首唱，眾心服。殿頭賜宴宮花簇。寫新詩、金牋競進，繡床爭蹙。御渥新摧霽進謝，一點恩袍先綠。歸袖惹、天香芬馥。玉勒金韉迎夾路，九街人、盡道蒼生福。爭擁入，狀元局」。姚勉，〈賀新郎、及第作〉，《雪坡集》，卷 44，頁 3 下-4 上。

33. 陳著（1256 年進士），〈錢塘白珽詩序〉收於其所著《本堂集》，卷 37。見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二集》、《本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2 下。

34. 周陳伯，《湛淵靜語》，原序（《湛淵靜語》為白珽著）收於《知不足齋叢書第九集》（上海：古書流通處，1921），頁 2 上下。

特殊的歷史情況，《宋史》裡沒有他的傳記，而他的文集可惜又沒有流傳下來，以致他竟被時間淹沒而變成一個相當暗晦的歷史人物。經過主要在《四庫全書》的電子版、及其他資料檢索後，我發現文及翁還有一些著作保存在地方志和同時代人的文集或所編撰的書裡。可貴的是，文氏遺存的著作數目雖不多，篇幅竟還完整，沒有殘缺。我已找到的尚存文氏著作一共有散文十篇、詩六首、以及被認為是他於1253年進士及第後作〈賀新郎〉詞一首。七篇散文是：〈〔漢〕文帝道德如何〉（這是文氏考進士時的策論，應作於寶祐元年〔1253〕）、〈《雪坡集》序〉（作於景定五年〔1264〕）、〈韓魯齊三家詩考序〉（作於景定五年）、〈《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作於咸淳元年〔1265〕）、〈朱公墓碑記〉（也作於1265年）、〈傳貽書院記〉（作於咸淳五年〔1269〕）、〈慈湖書院記〉（作於咸淳九年〔1273〕）、〈敕賜協順廣靈陸侯廟記〉（作於咸淳十年〔1274〕）、〈故侍讀尚書方公〔逢辰〕墓誌銘〉（作於至元三十年〔1293〕），以及不注明作於何時的〈道統圖後跋〉和〈李西臺書跋〉兩篇。^{（註36）}六首詩為：〈和東坡韻二首〉、〈次回仙韻二首〉、〈山中夜坐〉，以及於咸淳六年（1270）冬和賈似道贈潛說友的一首詩；前五詩不知寫於何時。^{（註37）}把這些尚存的作品，對照其友人所寫跟他有關的文章，以及有關南宋晚季的史料，本人覺得還可以把文及翁的生涯、為人、和學問，理出一個輪廓來。

文及翁的生卒年已經無可考了。我們現在還能找到的有關他事蹟的記載，大

35. 張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詩稿》〉，《西巖集》，卷18。見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7上。
36. 〈〔漢〕文帝道德如何〉，見魏天應編，《論學繩尺》，卷3，頁1上-6下，收於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嚴靈峰主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朱公墓碑記〉，《孝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第四冊，頁1152-1156。徐碩，《至元嘉禾志》，〈傳貽書院記〉，卷25，收入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13上-16上。袁桷（1266-1327），〈慈湖書院記〉，《延祐四明志》，卷14，收入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35上-38下。〈故侍讀尚書方公〔逢辰〕墓誌銘〉，《蛟峰文集、外集》，卷3，頁5上-20下，收入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傅增湘纂輯，《宋代蜀文輯存》（香港：龍門書店，1943初版，1971影印），上下兩冊，共一百卷，收有如下文及翁文八篇：〈《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雪坡姚舍人集序〉，及〈傳貽書院記〉三篇與本人文中所提者內容完全相同，而只是題目〈雪坡姚舍人集序〉與〈雪坡集原序〉相異而已；〈朱吉甫墓誌銘〉極簡短，似從收入《孝豐縣志》的〈朱公墓碑記〉中摘取銘辭全部及介紹朱氏幾句話成篇；此外，〈韓魯齊三家詩考序〉、〈敕賜協順廣靈陸侯廟記〉、〈道統圖後跋〉，和〈李西臺書跋〉四篇，本人只於傅增湘書中看到。
37. 沈季友，〈和東坡韻二首〉，《檇李詩繫》，卷30，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9上。〈山中夜坐〉，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謝翱，《天地間集》，無頁數。和賈似道贈潛說友的一首詩，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收入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97，頁11下。

多是他的官宦生涯的零碎記錄。例如,《南宋館閣錄、續錄》卷九〈官聯三〉「正字」條下,有如下一段記載:「文及翁,字時學,綿州人,癸丑(即理宗寶祐元年,公元 1253 年)進士及第,治詩賦。(景定)三年(1262)五月以太學錄召試館職,七月除,四年正月爲校書郎」。^(註 38)據此,文及翁在景定三年五月以前爲「太學錄」,七月被任用作「正字」,四年正月被任用爲「校書郎」。「錄」是掌管文簿等的職位,官階很低(正九品);而「正字」和「校書郎」則是校勘典籍、刊正文章的官位,^(註 39)官階還是很低(從〔即副〕八品)。陳騭(1154 年進士)所撰的《南宋館閣錄》記南宋立國後五十年(1127 至 1177)間的館閣制度,《續錄》是由後人依照舊有材料增續而成,包括的年代由 1178 年開始至 1269 年止。^(註 40)宋代的館閣(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館等三館與秘閣的合稱)是宋王朝的一個重要文官機構。其職務包括文獻整理、史書編纂、天文曆法、及其他中央政府的文化和行政事務。^(註 41)館閣又是宋王朝培養高級官僚的場所,因爲「館閣要員每遇國家重大典禮政事,可以預集議,可以備顧問,從而能夠協助朝廷開誠佈公,決疑定策,並不單在執掌圖書、校閱文字而已」。^(註 42)所以,文及翁能夠入館,算是作爲一個士人的極大榮譽。前引記載雖短,我們由之也知道了文及翁的字、籍貫、進士及第的年份、以及他爲學以治詩賦爲主。(其實,「治詩賦」大概是指他考進士時,考的是詩賦〔不是經義〕這一科,而非他只專門研究詩賦而已。)顧名思義,館閣錄所記,以與館閣有關的事件爲主。所以除了文及翁於 1253 年舉進士一事外,入館以前還有什麼重要事蹟,也就都付之闕如了。其實,文及翁的官宦生涯是早在他入館閣以前就開始了。

文及翁於 1253 年以榜眼及第後,朝廷並沒有馬上給他任何官職。目前可考的文氏最早官職是個地方小官。寫於咸淳元年(1265)的〈朱公(吉甫)墓碑記〉

38. (宋)陳騭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錄》; (宋)佚名撰、張富祥點校,《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8), 頁 353。

39.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第 3856 (*lu-shih* 錄事)、第 3857 (*lu-shih* 錄……事)、第 450 (*cheng-tzu* 正字) 和第 742 (*chiao-shu lang* 校書郎) 等四條, 頁 323、125, 及 142。本文中, 官階均根據 Hucker 書中所記, 不另外處處作註。

40. 劉迺蘇,〈《南宋館閣錄、續錄》序〉,同註 39, 頁 2。

41. 張富祥,〈前言〉,同前註,頁 1-2。

42. 張富祥,〈前言〉,頁 4。

以「曩余官吳興（湖州、吳興郡），爲節度府（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兩句開篇。^{（註 43）}文氏究竟何時開始任此職，因無記載，很難確定。與文及翁同時的周應元，在其《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討論「明道書院」之設置時，曾說：「開慶元年（1259），從山長之請，倣東湖書院例，置提舉官，以制幹文及翁兼充。尋省」。^{（註 44）}「制幹」，想係「制置使幹辦公事」的省稱。^{（註 45）}周應元似乎是用「制置使」來作「節度使」之別名，而「幹辦公事」則是制置使或宣撫使的幕僚。^{（註 46）}如果這個推測不誤的話，公元 1259 年的時候，文及翁正在吳興任節度府掌書記的職務。姚勉的《雪坡集》卷三十有〈回文本心榜眼〉一封信。「本心」是文及翁的書齋名，也用以爲號。^{（註 47）}信中言：「某久不奉起居，無時不仰德也。去年春，忽見當路辟尊年魁入幕府。相去遙遠，不知就與否？……某前日供職之明朝，即伏闕下進一書。……」。^{（註 48）}這封信不提撰寫的日期。《南宋館閣錄·續錄》卷八有記載：「姚勉，開慶元年十一月以除校書郎召，辭，景定元年（1260）正月一日依所乞除正字，六月再除校書郎，當月兼太子舍人，兼職依舊」。據此，則姚勉的回信應是景定元年（1260）正月三日寫的。而文及翁給姚勉的信則寫於他去吳興任節度府掌書記職以前了。既然姚勉信提到「去年春，忽見當路辟尊年魁入幕府」一事，那麼，文及翁是在開慶元年（1259）這一年開始作官的，距他考中進士已經有六年了。不過，自此以後，文及翁的仕途好像就比較平順一點。

如前述，文及翁於景定三年（1262）五月以前，已經正式入館作「太學錄」，七月除「正字」，並於四年（1263）正月被升任「校書郎」。我們現在再看看景定

43. 全記存於《孝豐縣志》（共四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9，冊 4，頁 1152-1156。所引二句，見該冊，頁 1152。關於「昭慶軍」，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冊 11、12，卷 167，註 13，頁 3984。

44. 周應元，《景定建康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29，頁 1176。

45. 周應元稱自己的官銜爲「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而把「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縮爲「江東撫幹」，「撫幹」當即「安撫使司幹辦公事」之省文也。見《景定建康志》每卷前，周應元所提自己的名字與官銜；「江東撫幹」一語，請看卷 29，周應元名下所附數語，頁 1184。

46.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頁 156，第 957「*chih-chih shih* 制置使」條；頁 144，第 777「*chieh-tu shih* 節度使」條；及頁 276，第 3136「*kan-pan-kung-shih* 幹辦公事」條。

47. 在〈慈湖書院記〉裡，文及翁說：「而及翁平生讀書，以本心名齋」。而他在〈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原序〉的題款說：「本心翁文及翁書於道山堂」。此序寫於咸淳元年，即公元 1265 年，不知此時文氏年齡多大，竟自稱爲「翁」。袁桷，〈慈湖書院記〉，《延祐四明志》，卷 14，頁 35 上-38 下；〈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原序〉見《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48. 姚勉，《雪坡集》，卷 30，頁 15 上下。有關姚勉任校書郎職，見《南宋館閣錄·續錄》，頁 335。

四年以後五、六年間《南宋館閣錄·續錄》有關文及翁的記載。卷八「著作佐郎」條下有「文及翁，（景定）五年（1264）八月以秘書郎（正八品官）除，咸淳元年（1265）四月爲著作郎（從七品官）」，及「著作郎」（從七品官）條下有「咸淳元年四月以著作郎除，六月知漳州（福建漳州）」兩段話；卷七「少監」（官階不明）條下，有如下很長一段：「文及翁，（咸淳）四年（1268）十月以國子司業（正六品官）兼禮部郎官（正或從六品官）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正八品官）、實錄院檢討官除秘書少監，仍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官階不明）；十一月除直華文閣知袁州（江西宜春）」。^{（註 49）}根據這幾條記述，我們知道，景定五年（1264）八月以前，文及翁已經是秘書郎了。可是，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由從八品的校書郎升爲正八品的秘書郎，因爲《南宋館閣錄·續錄》漏了記載。總而言之，以《南宋館閣錄·續錄》的記載來看，從 1262 年前入館以後到 1268 年，文及翁大部分時間是在中央政府的館閣裡服務。他的〈道統圖後跋〉開篇「余曩遊太學，留中都」一句，當是指這一個時期的事情。^{（註 50）}其間有兩次他曾經被派到外地去當知州。

《南宋館閣錄·續錄》止於咸淳五年（1269），而文及翁可能咸淳四和五年都一直在作袁州的知州，所以該書也就再無關於他的記錄。然而，文及翁的仕途並不到此爲止。有關文氏於咸淳四年以後的升遷事蹟，本人還找到了兩件尚存的資料。首先，〈傳貽書院記〉以「咸淳五年，陽生十日，朝請郎（正七品官）直華文閣、權知嘉興軍府、兼管勸農事、節制澈浦金山水軍、文及翁記」作結。^{（註 51）}所以，此記寫於咸淳五年十月十日，當時文及翁已從袁州知州轉任嘉興軍知州了。元蔣正子著《山房隨筆》有短短一條記曰：「文本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賈相啓中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註 52）}如果此短記屬實，則文及翁也曾經被朝廷派去治淮郡，時間則是在 1259 至 1275 賈似道（1213-1275）當宰相那十六年之間。^{（註 53）}「淮郡」是否就是指「嘉興軍府」？若是，則

49.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頁 324、290、258-259。

50. 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卷 94，頁 1195。

51. 徐碩，《至元嘉禾志》，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卷 25，頁 16 上。

52. 蔣正子，《山房隨筆》，收於《癸辛雜識·外八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1040-336。

53. 賈似道於景定元年（1260）被理宗任命爲丞相，於德祐元年（公元 1275 年）二月他親自統率的大軍，在

文及翁的謝賈似道啓寫於咸淳五年。由於文獻缺乏的緣故，文及翁作館閣裡官員及外放治州郡的政績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過，我們也找不到有關於他的任何負面記載。文及翁之能不斷地累升也許正表示他是一個負責能幹的官吏。

另外，潛說友（淳祐元年〔1241〕舉進士）撰著的《咸淳臨安志》，錄有賈似道的〈咸淳庚午（1270）冬大雪，遺潛侍郎〉七言律詩。當時，共有八位「侍從」（即潛說友、章鑑、方逢辰、陳宜中、鮑度、盧鉞、陳存、文及翁、曹元發等人），都各有和詩。其中，潛說友和盧鉞各和了兩首，其他七人則每人只各和了一首。看了各侍從的和詩後，賈似道又「再賦二首」，而潛說友也再次寫了和詩與跋。（註54）趙升在其《朝野類要》裡說：「翰林學士、給事中、六尚書侍郎（從三品官），曰侍從。中書舍人左右史以下，曰小侍從」。（註55）九人中除文及翁是「右史」（官階不明）外，其餘都是「侍郎」，所以文氏只是「小侍從」，官階最低。根據這裡的記述，我們知道咸淳六年的時候，文及翁又已經回到中央政府服務了。在寫於咸淳九年（1273）某良月吉日的〈慈湖書院記〉末，文及翁自己題名曰：「朝奉大夫（正五或從六品官）權尚書戶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侍講、文及翁」。（註56）此後他好像就沒再離開中央政府。

《宋史》卷二百一十四〈宰輔五〉提到，德祐元年（1275）二月己巳（即陰曆二月二十八日），「文及翁自試尚書禮部侍郎除簽書樞密院事（從二品官）」。（註57）由此可見，在德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文及翁已經從咸淳六年冬的中書舍人右史之職位累升至試尚書禮部侍郎了。而在德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這一天，他被朝廷由從（即「次、副」之意，相對於「正」而言）三品的尚書禮部侍郎，轉升到從二品的簽書樞密院事職位去。（註58）在宋朝，被朝廷擢拔為「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或「同簽書樞密院事」，就是「進入執

丁家洲（在今安徽銅陵東北長江中）被元兵擊潰後，才被罷去相位。見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385、436-439。

54.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97，頁10上-12上。

55. 趙升，《朝野類要》，收於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9），卷2，頁16。

56.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4，頁38下。

57. 脫脫等撰，〈宰輔五〉，《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214，第15、16冊，頁5653。

58. 有關宋時侍郎及簽書樞密院事的官品，請看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頁426-427, 第5278「shih-lang 侍郎」條，及頁154, 第924「ch'ien-shu shu-mi yuan shih 簽書樞密院事」條。

政行列」了。(註 59)不過，在這個時候被擢升為朝廷的高官，已不是什麼令人慶賀的事情。

早在同年(1275)二月庚申(十九日)，賈似道的先鋒孫虎臣與元軍已戰於丁家洲(在今安徽銅陵東北長江中)敗績，元軍乘勢衝殺賈似道親率的十三萬精兵，宋軍潰不成軍，賈、孫兩人以「單舸奔揚州」。(註 60)自此以後，元兵沿長江而下，所過州郡，「大小文武將吏，降、走恐後」。(註 61)當然，也有一些文官武將，奮勇抵抗，盡忠殉國。元軍很順利地從北、西、南三面進行「對兩浙地區的戰略包圍」。(註 62)到了三月庚寅(十九日)，元兵「已迫畿甸，勤王兵不至，人情恟恟。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自遁。浙東提舉王霖龍遁。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侍從以下，數十人並遁。朝中為之一空焉」。(註 63)次日，朝堂出現了一榜，略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汝哉？今內而庶僚，叛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裡合謀，接踵宵遁」。(註 64)《錢塘遺事》此處用「機政」，即「宰執職事之謂」。(註 65)四部叢刊本《文山先生全集》卷六裡，有文天祥於咸淳十年(1274)寫給文及翁的信，在題目「與文侍郎及翁」下有小注曰：「號本心，川人，後參政」。(註 66)參政就是「參知政事」的省稱，在宋時，職位相當於「副宰相」。(註 67)因此，朝堂

59.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364。

60. 脫脫等撰，《宋史》，卷 47，頁 925-926。

61. 蘇天爵，〈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國朝文類》，卷 31，引於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37。

62. 蘇天爵，〈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國朝文類》，卷 31，引於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37。

63. 劉一清，〈朝臣宵遁〉，《錢塘遺事》，卷 7，頁 155。此條以「乙亥（德祐元年，公元 1275 年）正月，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起，但未言明元兵於何時迫近畿甸。此據脫脫等撰，《宋史》，卷 47，定為「庚寅」日。見該書，第三、四，頁 928。

64. 無名氏，《宋季三朝政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8），頁 57。依此，則朝堂榜以當時垂簾聽政的謝太后名義出。《錢塘遺事》所記，文字稍異，引孟子的話起榜，而「吾與嗣君」作「吾為嗣君」，則是以幼君帝昀名出矣。

65. 趙升，《朝野類要》，頁 17。

66. 熊飛、漆身起、黃順將校點，《文天祥全集》，頁 218。根據〈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表〉，文天祥於咸淳九年（公元 1273 年）冬「差知贛州」，翌年「三月，赴贛州。……六月，慶祖母劉夫人年八十七。……」（《文天祥全集》，頁 691）。〈與文侍郎及翁〉信中有「某治郡以來……祖母六月生日」等語，則此信必寫於咸淳十年六月以後，文及翁於次年（德祐元年，公元 1275 年）二月底除「簽書樞密院事」以前，無疑。復次，德祐元年正月朔日，元兵即渡江，不久朝廷即下詔，「召諸路勤王」（文天祥）奉詔起兵」（《文天祥全集》，頁 692），似不太可能於本年初，還給文及翁寫信。

67.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頁 517, 第 6868 「ts'an-cheng 參政」條，及第 6872 「ts'an-chih cheng-shih 參知政事」條。通常，像文及翁這種情況，其官職應作「簽

榜所譴責的「二三執政」很明顯地是指文及翁和倪普而言。《宋史》卷二百一十四〈宰輔五〉所記「(德祐元年)四月己未(十八日),文及翁、倪普削一官,奪執政恩數」,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註 68)《宋史》卷四十七又提到「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倪普諷臺臣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註 69)「出關遁」是在德祐元年三月十九日,但因文、倪的諷臺臣劾己章今已不存,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為什麼在出遁前已被彈劾。總之,文及翁頭尾只作了二十二天(即從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九日)的參政,他的官宦生涯也就以這個很不名譽的「宵遁」形式結束了。而宋恭宗也於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向元朝呈上投降表,^(註 70)南宋也實質上滅亡了。對文及翁本人來說,他之參與南宋亡國前最後一個執政團隊,是很大的不幸。後來他之所以變成一個隱晦的歷史人物,無疑是與這個大不幸有關聯的。

文及翁作官從政的時期,正好是賈似道當宰相的十六年。《宋史》卷四十七,理宗(在位 1225-1264)本紀的贊辭裡,有曰:「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1041-1048)、嘉祐(1056-1063),宜也。……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註 71)丁、賈兩人的傳記都收在《宋史》的〈姦臣〉類裡。在西方,前芝加哥大學教授 Herbert Franke 和先師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曾指出,賈似道的姦逆一向被中國歷史家過度地誇大,事實上,他在財政與田地政策方面有相當大的貢獻。^(註 72) Franke 認為宋朝時皇權已被提升到很高的地步,高到令往後的歷史家把亡國的過錯不推給「最後一位壞君主」(“the bad last ruler”),而都推給「最後一位壞宰相」(“the bad last minister”)了。

書樞密院事兼(或兼權)參知政事」。不知如何,《宋史》卷 214〈宰輔五〉脫後面數字。與文及翁同時但年紀比他大的陳著(西元 1256 年進士),於〈奉文本心樞密〉書裡稱他「相公先生」(對宰相之尊稱),又於〈與曹久可〉一信中提到「近收文本心樞相書」。(二信,見陳著,《本堂集》,卷 79,頁 4 下和 6 上)。文及翁曾當過「參政」、「副相」無疑。

68. 脫脫等撰,〈宰輔五〉,《宋史》,卷 214,頁 5653。

69. 脫脫等撰,《宋史》,卷 47,頁 928。

70. 脫脫等撰,《宋史》,卷 47,頁 937。

71. 脫脫等撰,《宋史》,卷 45,頁 888-889。此段引文最後三句,先師牟復禮先生曾譯成英文,並用以介紹理宗。見 Frederick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61。

72. Herbert Franke, “Chia Ssu-tao (1213-1275): A ‘Bad Last Minister’?,”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nis C.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17-234; Frederick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pp. 317-320, 461-462.

(註 73) 牟復禮老師曾對現代中國歷史學者不能完全拋棄《宋史》裡對於賈似道的偏見感到遺憾。(註 74) 不久前出版的《南宋史稿》作者何忠禮、徐吉軍兩先生，已經提出了對賈似道較公允的評價。例如，經過實事求是的考察後，他們認為，後人譏斥賈似道只管自己在杭州葛嶺尋歡作樂，罔顧邊境重鎮襄陽、樊城的存亡，是毫無歷史事實根據的。他們認為，事實是，賈似道對襄樊的情況瞭若指掌，也對之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物力、和財力，還曾經多次提出巡邊的請求，可惜都被度宗拒絕了。(註 75) 他們說：

賈似道是一個有功有過，過大於功的歷史人物。誠然，賈似道的獨攬朝政，排斥異己，妒賢忌能，奢侈腐化，拒留郝經等給南宋末年的政治帶來了不小的禍害，對南宋滅亡更負有重大責任。但是賈似道前期的戰功和治績，入朝主政以後對政治、經濟的一些整頓措施也有可取之處〔。〕

.....

賈似道作為一個擅權而亡國的宰相，遭到後人的譴責是無可非議的，但在當時所以很快地被朝野一致摒棄，則與他力主推行公田、推排等法，從而嚴重地損害了江南地主階級的利益有著直接的關係，特別是他的拘留郝經成了元朝滅亡南宋的藉口（實際上元滅南宋與郝經被扣留與否並無很大關係），更為時人所深惡痛絕。因此，在「壞人一切皆壞」的傳統史學觀點影響下，賈似道的罪行被誇大，功績遭抹煞也就不足為奇了。

(註 76)

關於賈似道前期的功過，何、徐兩先生說：

賈似道上台執政的前五年（1259-1264），正是蒙古南侵勢頭相對減弱的五年，使南宋政權尚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賈似道也正是利用了這一時機，采取一些措施來整頓政治、經濟和軍事，抑制了宦官、外戚勢力的發展，控制了台諫，牢籠了太學生，排除了一切有可能與他抗衡的

73. Herbert Franke, "Chia Ssu-tao (1213-1275): A 'Bad Last Minister'?", pp. 233-234.

74. Frederick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annotation 51, p. 998.

75.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25。

76.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41。

力量，從而完全控制了朝政和輿論。(註 77)

上面所引應該算是頗為持平之評價，雖然他們說「賈似道對襄樊的情況瞭若指掌」這一點，仍需進一步探討。但大抵而言，宋末元初人說賈似道「閫才有餘，相才不足」，堪稱一針見血之論。(註 78)無論如何，賈似道是個既複雜而又擁有許多缺點的人。他「既愛才，也嫉才」，不能容忍人家違忤他，卻又特別喜歡「佞諂之人」。(註 79)我們現在再回頭去看看前面提到的賈似道於咸淳庚午（1270）賦詩及在他周圍的九位侍從和詩的故事，由之來檢視賈似道的缺點，以及和這樣的人共事所不可能避免的一些問題。

潛說友除了和賈相詩外，又加了如下的跋語：

咸淳六年閏十月乙卯（即十九日），雪。越十一月辛卯（即二十六日），大雨雪。太師平章魏國公先生，作為詩章，為民志喜。不鄙微陋，而辱矚之。說友拜手欽誦，竊惟浩浩無偏，天地之心也。清明虛一，其著見固應耳。漢中興，再傳至于永平（漢明帝年號，公元 58-75 年），號稱熙洽，而詔過曰：「京師冬無宿雪，勞煩有司，積精禱求」。我國家景定以來，年穀比登，天休滋至，亦惟明良心、學純懿、位育之功，度越前代遠甚。而說友蒙賴嘉澤，匪勞匪煩。既與鄉遂之毗，歌詠公詩，交相慶幸。且刻諸石，以垂百世，傳之四海云。侍從各有和篇，並刻之石，附載於後。(註 80)

潛說友此跋，真是極盡阿諛諂媚之能事。賈似道所以贈詩給潛說友，大概是因為潛是九位侍從裡最會拍馬屁的，因此賈也最喜歡他的緣故。賈詩中有「瀟奕端由人所召，變調多愧病難任」一聯，大意是說老天大雨雪（瑞雪兆豐年），都是人的努力所招致；慚愧的是他多病，以致難以勝任協調天地之氣的任務。潛說友的第一首和詩有「采薇指日休兵甲」句，第二首有「聖朝事事合天心，……有美江山祇如舊，無塵宇宙幸逢今」等句，而跋更清楚地說，自景定（1260-1264）以來，

77.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17。

78. 語出《三朝野史》及〈后妃下〉，《宋史》，卷 243。見引於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41。

79.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19。

80.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 97，頁 10 上下。

風調雨順，年豐歲稔，是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而「聖朝」所以能夠「事事合天心」，不用說，都是賈丞相的功勞——賈似道是從開慶元年（1259）十月開始當宰相的。（註 81）跋中「浩浩無偏」四字取自賈詩「乾坤浩浩無偏處」句。其他八侍從是否出於自願，或出於不得已，也都作了和詩，也都在和詩裡說了些奉承話。如章鑑有「上宰心通上帝心」，鮑度有「三登氣象先呈臘，一統封疆後視今」，盧鉞有「公溥明通造化心」、「變調妙造推元老，治象陽明無伏陰」，曹元發有「三千界內清無際，數十年來瑞獨今」等句。連性格鯁直、且曾上書理宗批評賈似道而令賈不悅的方逢辰（1221-1291），也寫了「遠役載塗將撤戍，豐年高廩又從今」；不過方詩以「來自周原入禁林，升平風露洽民心」兩句起，如果我們把前引一聯當反語（rhetorical question）讀，則這些看似恭維之句，恐隱含暗諷。文及翁跟方逢辰一樣，沒在詩裡表達露骨的諂媚之辭，而有「身遊廊廟意山林，……屢豐歲事常如昔，太素風光直到今」等句；「身遊廊廟意山林」首句，似乎也可讀作表面恭維，而暗地裡在諷刺。不管如何，賈似道看了侍從們的和詩後，顯然很高興，因為他又用原韻再賦二首。這一次他就比較不客氣地寫了「上瑞以人誇自昔，太平有象適當今」的句子。潛說友也再和兩詩並跋。潛說友把關於他們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活動之記述與詩作「刻諸石，以垂之百世，傳之四海」。他們所刻之石久已不見，而他們的記述與詩作竟靠潛說友所著的《咸淳臨安志》，傳至今日，讓我們有機會去考察南宋滅亡前夕，朝廷裡幾個領導者的自大、自滿、不務實際的心態。

雖然蒙古人的領袖忽必烈（1215-1294）是到了咸淳七年（1271）十一月才改國號為「大元」，（註 82）他早就決定征服南宋，而且已經為此準備好多年了。他不斷地蒐集情報，籠絡顧問和專家（大部分是漢人，也有契丹、維吾爾、及其他種人），積儲軍隊所需的補給品等。（註 83）因為蒙古人不會造船、不諳水戰，所以忽必烈利用漢人或朝鮮人造船，以便在中國南方河流裡搬運蒙古騎兵馬隊到各處去打仗。咸淳四年（1268）八月，蒙古將軍阿朮和於景定二年（1261）投降蒙古的南宋大

81. 脫脫等撰，〈宰輔五〉，《宋史》，卷 214，頁 5638。

82.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23。

83. 在其巨著 *Imperial China, 900 to 1800* 裡，牟復禮老師曾對忽必烈之征服南宋作過極詳細的敘述。請看該書第十九章：“Kublai Khan Becomes Emperor of China”，頁 444-465。

將劉整開始圍攻在長江中游的兩個重鎮：襄陽和樊城。^(註 84)因為南宋兵力其實還相當強大，而襄樊又地勢險要、城池堅固、儲備豐富，元軍一時也無法取下雙城。於是，阿朮乃聽劉整所獻的計，造船五千艘，練水軍七萬，以作攻破襄樊、消滅南宋的準備。^(註 85)反觀南宋朝廷，我們幾乎可以說當蒙古軍不斷在加強其對襄樊之攻擊時，賈似道等人正在慶幸他們活在一個升平富裕的世界裡。前面已提過，雖然這其間，賈似道曾經向度宗（1264-1274 在位）上過奏，要求親自到荆襄去巡邊，可是，度宗居然拒絕他的請求。而群臣竟然也紛紛上奏勸阻，賈似道終於也就留在京城，直到德祐元年（1275）二月被迫親自率兵去安徽對抗元軍為止。此後再過不到一年，臨安也就淪陷了。咸淳六年（1270）冬，賈似道、潛說友等人所幻想的「指日休兵甲」、「一統封疆」、「三千界內清無際」的「太平」日子卻永遠沒有到來。

潛說友等九個侍從裡，恐怕是文及翁和方逢臣比較特出些，關於這點後面再說。現在先把尚可看到記載的其他三個人簡單交代一下。《四庫提要》說潛氏：

咸淳庚午（1270），以中奉大夫（正四品或從五品官）權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封縉雲縣開國男，時賈似道勢方熾，說友曲意附和，故得進。越四年（1274），以誤捕似道私秣罷。明年起守平江（屬今蘇州），元兵至，棄城先遁。及宋亡，在福州降元，受其宣撫使之命。後以官軍支米不得，王積翁以言激眾，遂為李雄剖腹死。其人殊不足道。^(註 86)

章鑑被賈似道提拔，於咸淳十年拜右丞相，可是明年當元兵來時，竟「託故徑去」；他在朝時，「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滿朝歡』云」。^(註 87)陳宜中則是一個擅長投機、混水摸魚的人。^(註 88)章鑑逃走以後，陳宜中與王爚被拜為左、右丞相，不久兩人又不和。陳宜中本來也是賈似道的黨徒之一，可是當賈似道兵敗時，他立即上書給謝太后，乞誅賈似道。^(註 89)後來他遣使向元人求和被拒後，

84.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15。

85.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16。

86. 《咸淳臨安志》、《四庫全書提要》。《提要》雖認為潛說友人殊不足道，卻不以人廢言，而認為他的《咸淳臨安志》是一部頗有價值的書。

87. 脫脫等撰，《宋史》，第 35-36 冊，卷 418，頁 12529。

88.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39。

89.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39。

轉向謝太后請遷都，可是等到元帥伯顏駐軍臨安外的皋亭山時，他就「宵遁」了。(註 90)之後，他又應益、廣二王的號召，來溫州參加陸秀夫、張世傑等人領導的抗元鬥爭，作益王的左丞相。不久，他又與陸、張等人都有了矛盾。端宗（即益王）景炎二年（1277）十二月，南宋政權被迫轉移到井澳（在廣東珠江口外）時，他看事無可為，乃藉口先去占城（在越南中南部）聯絡，從此一去不返。(註 91)陳宜中最後逃亡到暹羅去，也死在那裡。(註 92)從這幾個例子看來，宋亡前賈似道所任用的朝中大官，大部分是不太中用、沒才幹、也沒節操的人。

現在我們就拿目前還看得到的資料，來進一步了解，也許比以上所談三個人都好得多的文及翁。前面已經提過，姚勉於景定元年（1260）正月曾給文及翁寫了一封回信。此信裡有一些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文及翁早年的人品與性格。前文已引「去年春，忽見當路辟尊年魁入幕府」語。稍後於此，姚勉接著寫：

至秋乃見前之辟年魁者，轉而為後之怪舉。以駭、以愕、以歎、以惜。非為左右駭愕歎惜也，以其好賢之不竟也。尊年魁，清標勁節，何疵可指？特今之世，喜佞惡拂，在在皆然，必是積忤不能堪耳。然終不見其毀日月之辭。前月道三衢，會陳劑院景初同年，方能言其故，果如某之所料。此於盛德何損？公論在天下，曲直有所歸矣。(註 93)

如前所述，姚、文兩人於寶祐元年（1253）以狀元和榜眼及第後，仕途並不順利。文及翁給姚勉的信（今已失佚）和姚氏此封回信，主要是在談論這個事情。姚勉對於前曾徵辟文及翁入幕府之「當路」的「好賢之不竟」，感到駭愕。他安慰他的朋友說，處於一個「喜佞惡拂」的時代，他之不被用，全是抵忤了什麼當路人所致。他稱讚文及翁的「清標勁節」，已經有公論在天下，毫無瑕疵可指。「清標勁節」是對文及翁的人格品質很高的讚美，稱揚他有高潔不俗的風神與堅強不屈的節操。文及翁在年輕時的實際生活與修養，是否真正配得上這個美譽，因無任何記載，我們無法證實。不過，我們倒可以想像，一個有「清標勁節」的年輕氣盛

90. 脫脫等撰，《宋史》，卷 418，頁 12532。

91.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58-460。

92.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39。

93. 姚勉，《雪坡集》，卷 30，頁 335。

的新榜眼，是很可能在受同年激刺鼓動的情況下，賦出那首〈賀新郎〉詞的。而那首詞一旦被流傳開來，是可以抵忤一些胸懷比較狹窄的當路、在位人的。必須聲明的是，此處所言純屬臆測，因為我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記載來證明這的確是姚勉信所隱含的意思。

無論如何，「清標勁節」無疑是文及翁和一些同時代人所崇奉的一個作人的理想。文及翁本人在其〈朱公墓碑記〉裡，就用「清名勁節，照映當代治狀，焯焯可紀」來讚揚朱吉甫的祖父朱應祥。^(註 94)在其〈雪坡集原序〉裡，文氏說他於寶祐元年在期集所初次和姚勉見面時說：「握手論心，知其慷慨有大志」。接著，他又說：

越明年，予遊清江碧潭間。距瑞陽（姚勉家鄉）三舍，竹輿山行，入境問俗，知其倜儻有義氣。爾後渭北江東，末由再晤。四方傳誦，累疏囊封，奮世嫉邪，排奸指佞，又知磊磊落落有奇節。夫以成一（姚勉字）之志與氣節，奮乎百世上下，而官僅校黃本書備青宮案，年僅四十有六，遽修白玉樓、騎鯨白雲鄉去，豈不可悲也夫？^(註 95)

此段讚美朋友之辭，文字多，有細節，然而其主要意思，可說與「清標勁節」四字相應合。此外，在〈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那篇長文裡，他又說：「理宗臨軒策士，以公（即方逢辰）所答敷陳鯁亮，擢為進士第一」。^(註 96)「敷陳鯁亮」四字，係出自理宗的〈除正字誥〉：「敕承事郎方逢辰，朕庚戌（1250）親策，有以時幾對，居第一。敷陳鯁亮，群經生學士所不能到」。^(註 97)「鯁亮」就是「剛直坦率」的意思，是理宗讚許方逢辰為人剛直，敢於正言直諫的用辭。後來度宗也在〈除司封郎誥〉中說：「爾逢辰，先朝倫魁，植學有淵源，立朝有本末，氣節端亮，議論激昂」。^(註 98)方逢辰可說是當時在朝廷作官的人應該仿效的典範。而文及翁能讚賞、崇拜鯁亮的氣節，應無問題。關於方逢辰，後文我還會再討論。現在先把有關文及翁個性的問題交代清楚。

94. 文及翁，〈朱公墓碑記〉，《孝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9，第四冊，頁1153。

95. 文及翁，〈雪坡集原序〉，見姚勉，《雪坡集》，頁1上下。

96. 文及翁，〈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見方逢辰，《蛟峰文集、外集》，卷3，頁5下。

97. 方逢辰，〈敕正字誥〉，《蛟峰文集、外集》，卷1，頁2上。

98. 方逢辰，《蛟峰文集、外集》，頁6下。

除了姚勉在信上稱讚文及翁年輕時「清標勁節」外，我還沒再找到別人用類似的字眼來恭維他，或記述他作官時的言行。我倒看到兩段有關他官宦生涯已近尾聲時的重要文字，應該提出來討論。其一，在大概寫於咸淳十年（1274）的〈與文侍郎及翁〉信裡，文天祥說：「邸狀間屢見丐祠，尊性樂在簡淡，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但老文學為諸儒典刑，真侍從為朝路風采，上必不聽去耳」。(註 99) 其二，陳著在〈奉文本心樞密〉信上說：「先生靈光其身。砥柱斯道。頗聞時棹葉舟，攜壺束菜，與道義交遊山水佳處，常是終日。可謂樂其自樂，非流俗所能喻」。(註 100) 陳著在信裡稱呼文及翁為「樞密」，因此此信很可能是於文氏在當「簽書樞密院事」那二十二天內寫的。「丐祠」指乞求「祠祿」；這是宋朝的制度，大臣求罷職「令管理道教宮觀，以示優禮，無職事，但借名食俸」。(註 101) 有趣的是，從這兩段文字來看，此時文及翁已經達到了他一生官宦生涯的最高峰了，然而他卻對作官已經感到非常的厭倦。以前姚勉所欣賞的「清標勁節」，現在沒有了，或者說是只剩下清標那部分，而且變成簡約淡泊。

當然，「與道義交遊山水佳處」與「簇樂紅妝搖畫舫」的沉醉湖山的遊湖方式，有很大的區別。陳著所描述的文及翁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樂其自樂」之方式，究竟是與流俗的嬉遊迥異，而是接近《論語·先進篇》第二十五章所記載的曾點之樂的。曾點在回答孔子的「盍各言爾志」一問時，先說他自己「異乎三子者（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撰」，然後說他所喜好的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曾點這個與三位同門不同的回應，當下獲得孔子「吾與點也」的讚賞。(註 102) 「曾點之樂」是宋儒在解說《論語》時頗為關注的議題之一。在宋儒對於此章的詮釋中，以遵循程顥看法而加以發揮的朱子解說地最為精彩透徹，也對後世讀《論語》者最具影響力。(註 103) 朱子談論此章的話很多，底下這幾句引自《朱子語類》的話可說具有代表性：

99.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頁 218。

100. 陳著，〈奉文本心樞密〉，《本堂集》，頁 4 下。

101. 《辭源》，頁 1230，「祠祿」條。

102. 朱熹，《四書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9），頁 129-131。

103. 有關《論語·先進篇》第 24 章，臺灣大學張亨教授曾發表過一篇極精到的論文。見其所著〈《論語》中的一首詩〉一文，收於《思文之際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469-495。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即子路等三人）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註104）

文及翁讀過包括《四書集注》的許多朱子著作，應無問題。他時常與朋友到「山水佳處」去行樂，正表示他把「曾點之樂」付諸實習。

在描寫文及翁的性情時，文天祥可能是用了一首蘇東坡詩及注的典故。蘇東坡的〈贈善相程傑〉詩如下：「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搢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裡微言卻近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巔賞遍洛陽春。」「急流勇退豈無人」句下有注曰：「次公本朝錢若水，見陳搏先生，有一僧擁褐對坐，謂：『若水非神仙骨，但卻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其僧乃白閣道者」。（註105）文天祥知道文及翁曾屢次向朝廷請求「祠祿」，可是同時他也了解，像文及翁這種性樂簡淡、有學問、有風範的官員，朝廷是不會輕易放走的。我相信「老文學爲諸儒典刑，眞侍從爲朝路風采」是文天祥的真心話，因爲他不是個「佞諂之人」，也沒有諂媚文及翁的必要。我也相信他說文及翁是個能「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是眞能了解一個朋友的敏銳觀察。可惜文及翁雖有急流勇退的勇氣，卻未能取得上面的批准，以致變成在國家災難關頭「宵遁」的執政之一。

如上所述，文及翁從一個有「清標勁節」的傑出年輕士人，翻身一變而成一個「性樂簡淡」，深望能從官場的「急流」中「勇退」的隱逸型人物。這應該不是突然轉變的事情吧。周密撰的《齊東野語》有〈景定彗星〉一條，詳細記載景定五年（1264）七月二日天上出現彗星之事。理宗於七月五日「避殿減膳，下詔責己，求直言」。（註106）於是很多官員上疏批評公田法之害，並請理宗將之廢除。該條中有如下文字：

104. 朱熹，《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卷40，頁1033-1034。

105. 王十朋，《東坡詩集註》，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9，頁8上。

106. 周密撰，朱菊如、段颺、潘雨廷、李德清校注，《齊東野語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頁340。

班行應詔言事者，秘書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極珪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於公田。東南民力竭矣。公田創行，將以足軍儲，救楮幣，蠲和糴也。奉行太過，限田之名，一變而為併戶，又變而為換田。耕夫失業以流離，田主無辜而拘繫。此彗妖之所以示變也」。(註 107)

本人認為，此處「秘書郎文及肩」應該就是「秘書郎文及翁」，「翁」變成「肩」應該是《齊東野語》在後世刊行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訛誤。前已提出，根據《南宋館閣錄·續錄》的記載，文及翁是於景定五年（1264）八月「以秘書郎除」為「著作佐郎」。(註 108) 因此，在此之前，他已經由「校書郎」被升為「秘書郎」。我查遍《南宋館閣錄·續錄》和《宋史》，並無「文及肩」這個人。電子版的《四庫全書》裡，「文及肩」也只在《齊東野語》出現過這麼一次。在景定五年七、八月間，南宋不可能有兩位秘書郎，且一位叫文及翁，另一位叫文及肩吧！此外，還有一個記載也可引來作為旁證。明朝徐象梅所撰的《兩浙名賢錄》，列有如下一條：「文及翁，字時學，綿州人，徙居吳興。歷官至資政殿學士。景定間，言公田事，有名朝野。宋亡，元世祖累徵不起。閉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註 109) 《四庫提要》曾說徐象梅「所列之人，本正史者，十僅二三；本地志者，乃十至六七。以鄉間粉飾之語，依據成書。殆亦未盡核實矣」。(註 110) 文及翁並非正史全無記載的人，若說此條徐象梅也用了點「鄉間粉飾之語」，則「元世祖累徵不起」一語，也許不一定完全是事實，可算一例。至於「言公田事」，則應係依據較早出的《齊東野語》之類的書而來。總而言之，認為文及翁是第一個向理宗上奏批評賈似道的公田法的人，是合理而具說服力的。

如果上面的推測不誤的話，那麼文及翁的「首言公田之事」正是他「清標勁節」的具體行動表現。文及翁首先開砲以後，朝廷內外的官吏，還有士人、武學生，繼起攻擊公田法者很多。言公田的奏疏大都「援引漢唐以至本朝彗變災異」，(註 111) 來批評時政之敗壞，而且也多直接或間接地把賈似道當作攻擊的鵠的。批

107. 周密撰，朱菊如、段鸞、潘雨廷、李德清校注，《齊東野語校注》。

108. 陳騭等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錄·續錄》，頁 324。

109. 引於《浙江通志》，卷 194，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

110. 李岩、余喆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頁 869。

111. 朱熹，《四書集注》，頁 129-131。

評最爲激烈者之一是奉祠祿在家的秘書監高斯得。^(註 112)其〈彗星應詔封事〉原文很長，只取幾段來作例子：

陛下數年以來，專任一相，心虛委已，事無大小，一切付之。果得其人，宜乎天心克享，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而庚申（1260）以來，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繼以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大翔，民命如線，景象急迫，至此極矣。今又重以非常之異，妖星突出，光芒竟天。夫柳爲鶉火。火者，國家盛德所在，而彗星出焉，其變不小。若非朝廷政事大失人心，則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乎？……自井田既廢，養兵之費，皆仰租稅。漢唐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今也騁其私智，市田以餉。自謂策略高妙，前無古人。陛下知其非計，嘗欲罷之，有秋成舉行之命，彼悍然不顧也。白奪民田，流毒數郡，告、牒棄物，不售一錢。遂使大家破碎，小民無依，米價大翔，飢死相望。……陛下所恃以有天下者，人心而已，今大臣盡失之。則其相與愁痛號咷，哀籲上蒼，產妖種孽，以警悟陛下，又何足怪哉？況近歲以來，天生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立人本朝，惟知有權門而不知有君父。或稱其再造王室，或稱其元勳不世，或直以爲功不在禹、周公下。虛美溢譽，日至上前，熒惑聖明，掩蔽罪惡。遂使陛下深居九重，專倚一相。高枕而臥，謂真如泰山四維之真可倚。不知下失人心，上招天譴，乃至於此。豈非群臣附下罔上之所致哉？陛下試觀五年之間，廷紳奏疏，不知凡幾千百，亦有一語事關廊廟者乎？意之異己者盡斥，位之偏己者盡除。上自執政侍從，下至小小朝紳，無一人而非其黨。雖學校諸生，亦復數年噤無一語。言路久已荊棘，所以養成大臣橫逆之氣，人怨天怒，不至於彗出不止也。……願陛下取崇寧彗出故事，反覆披覽，力見施行，因大臣求退而亟許之。取庚申以來一切刻薄害民之政，即日罷去。申嚴仁宗著令，爲子孫萬世之法，而又盡滌聖心，力行好事，收召貞賢，昭洗冤魄，以答天心，以慰人望。如此十日，而妖星不滅，則寸斬臣以謝大臣，以戒狂妄，臣不敢

112. 這是根據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的意見，見該書，頁 404。

辭。(註113)

又有京庠學士唐棣、楊坦等上書言：

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意紛更，殊駭觀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胄延賞，巧摘瑕疵。薪茗搨藏，香椒積壓，與商賈爭微利；強買民田，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矣。夾袋不收拾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冶，而務行非僻之方術。縱不肖之駉弟，以卿月而醉風月於花衢；籠博弈之舊徒以秋壑而壓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釀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宄也，乃優縱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之說，以力解，亂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千天怒。彗星埽之未幾，大火又從而災之，其尚可揚揚入政事堂耶？(註114)

因為中國古代有認為天然災異乃為政者有重大闕失所致之迷信，所以才有那麼多官員與學士，趁彗星出現的機會上書皇帝，反對公田法以及推行此法的賈似道和屬於其黨的朝中大官。賈丞相似道當然是個極精明、厲害的人，所以他在理宗下罪己詔後第三天（即七月七日），立刻與楊參政棟、葉同知夢鼎、姚簽書希得等，上疏自疚「乞罷免」。賈似道更於七月八日連續五次上疏給理宗，自請罷免。高斯得疏中「因大臣求退而亟許之」一句，可能是知道賈似道等人求罷之後而發的。可是理宗全不接受。

我同意何忠禮、徐吉軍兩先生的看法，認為當時官員和學生所以強烈反對公田法，主要是此法把「『田主』、『富家』、『大家』的土地，強買走了，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註115)文及翁對於公田法的批評，應該也是出於維護大地主階層利益的動機。其實，賈似道的公田法措施，從理論到實踐，都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113. 高斯得，《恥堂存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5），卷1，頁19-22，收於《叢書集成初編》。

114. 周密撰，朱菊如等校注，《齊東野語校注》，頁342-343。

115.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404。

(註 116)南宋因為外有強敵壓境，所以一直擁有龐大的軍隊，造成軍費負擔沉重，軍糧需要量也很大。而政府通過稅收所獲取的糧食並不多，軍糧主要是靠和糴來供應。和糴是政府出錢購買民糧以充軍用的方法。由於買糧給價太低，且大多以楮幣、度牒充數，而楮幣後來又嚴重貶值，度牒賣不出去，和糴困難越來越大。此外，南宋又有日趨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早在寧宗（1195–1124 在位）嘉定十年（1217），葉適就已經提出「買田贍養諸軍」的建議。後來，「景定三年（1263），正當理宗和右丞相賈似道被造楮、和糴、軍糧供應等問題搞得焦頭爛額之際，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等共同奏上「回買公田之策」，賈似道馬上就採納他們的建議，並於景定四年二月開始在浙西六個盛產糧食的州郡試行公田法。(註 117)回買公田的起點限制在一百畝，即以中小地主以上為限，因此貧苦農民可說基本上不受影響。由於官僚地主的反對和破壞，吏治腐敗導致執行中百弊叢生，以及回買田價過低且多不兌現等原因，公田法的推行很混亂，對南宋社會產生了壞影響。最後在德祐元年（1275）三月，隨賈似道兵敗，丁家洲被罷黜，公田法也被廢止。

上引兩篇奏疏，雖然都有維護大地主利益之處，可是其指責賈似道黨團之腐敗，有許多也是存在的事實。高斯得及唐棣等人敢於冒險上疏痛批朝廷之腐亂，其勇氣值得佩服。與這兩篇比較，《齊東野語》所錄文及翁那幾句話，實在溫和多了，這點也許跟他個性不是很激烈有關。他承認公田法創行之目的，在於「足軍儲，救楮幣，蠲和糴」，而其批評則集中在「奉行太過」這一點上。在此我要強調說明的是，景定彗星事件對於文及翁在中朝作官的行為上之可能影響。在唐棣等呈上那些「言之太訐」之書後，賈似道、劉良貴等人開始反擊，把這些京庠學生以「不合謗訕生事」的罪名，送往臨安府治罪，「自是中外結舌」。(註 118)雖然沒有任何官員受到朝廷的懲罰，但賈似道能贏得皇帝的全力支持，把反對公田法的大聲浪鎮壓下去，對於當時朝內朝外的官員，肯定是有影響的。對於那些敢於不避艱危去忤賈似道的人（如吳潛、方逢辰、文天祥等）而遭免官甚或竄逐的事情，文及翁也不可能不熟悉。也許這些事情使文及翁往後在朝作官之言行變得非常謹

116. 此處對於公田法之簡述，都根據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397–407。

117.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401。

118. 周密撰，朱菊如等校注，《齊東野語校注》，頁 344。

慎。實際情形是否如此，因缺乏文獻，很難證實。我只在宋濂（1310-1381）所著的〈吳思齊傳〉裡看到這幾句話：「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帝王出駕時的儀仗部隊）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註 119）}賈似道喪母，時在咸淳（1274）十月，^{（註 120）}係在其未敗之前。文及翁此時表現得膽小、有顧忌，受人批評。高斯得奏疏裡所說，自賈似道擅權以後，「言路久已荆棘」的情況，恐怕不全是誇張之辭。文及翁從一個有「清標勁節」的人變得怯懦，令人失望。不過，他處於那樣的環境裡，凡事也不得不有所顧忌。

《南宋館閣錄·續錄》曾提到文及翁「治詩賦」，但是根據尚存材料，實際上他的治學範圍要比詩賦廣闊得多。遺憾的是，現在還可看到的文及翁著作究竟太少，我們不但不能窺其學問全貌，而且也無法知道他的成就。詩賦方面，本人只找到了六首詩、一首詞；其中，除了可能是他作的〈賀新郎〉是篇傑作外，其他六首詩，雖大體上不錯，但無特別精彩之處。例如，宋遺民謝翱的《天地間集》錄有文及翁的〈山中夜坐〉：「悠悠天地間，草木獻奇怪。投老一蒲團，山中大自在」。^{（註 121）}此五言絕句讓我們知道，宋亡後文及翁晚年過著像隱居山中的和尚一樣的生活；不過，詩本身並沒什麼了不起。清朝沈季友的《橋李詩繫》錄有文及翁和蘇軾的兩首七言律詩。詩題為「本心長老文及翁」所作。作者名後、詩前有小注說：「文及翁，字本心，蜀眉州人，住秀州（即嘉興府）本覺寺。蘇文忠三度過訪，因立三過堂，勒詩傳焉」。^{（註 122）}小注解釋不夠清楚；蘇東坡是三次經過本覺寺，不是拜訪文及翁。根據小注，文及翁晚年不是出了家就是過著跟和尚一樣的生活。他的〈和蘇學士東坡韻二首〉如下：

萬歲山藏不二中，九峰峰下善財童。

敲門問竹機聲觸，倚檻看花色界空。

汝坐蒲團曾有夢，我來芻牧愧無功。

吳天蜀地原來近，月照峨眉日又東。

119. 《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宋濂，《文憲集》，卷 10，無頁數。

120. 脫脫等撰，《宋史》，卷 233，頁 13785。

121. 《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謝翱，《天地間集》，無頁數。

122. 沈季友，《橋李詩繫》，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9 上。

身滿華嚴法界中，香廚底事感天童。
 那知本覺從何覺，纔悟真空自不空。
 若有相時原說夢，到無言處卻收功。
 一鉤月出星三點，汝向西來我面東。(註 123)

「我來芻牧愧無功」句，當是指他以前在吳興節度府掌書記的事情。這兩首七律，對仗工整，文字清淡，充滿佛家的意味，從中可看出他晚年的心境。這是文及翁現存六首中最好的兩首詩了。

曾在至元（忽必烈在位年號，1264-1294）末年在松江作知府的張之翰，寫了〈跋王吉甫《直溪詩稿》〉短文：

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
 蓋不知詩法之弊，始於晚唐，中於四靈，又終江湖。觀直溪所作，至其得意處，可以平步晚唐，矧江湖四靈乎？悠悠風塵，作者日少，我輩更當向上著眼。江南耆舊中，尚有文本心在。聞吉甫嘗遊其門。他日試呈似之，公必笑領。(註 124)

張之翰是元初著述甚富的士大夫、文人，《四庫提要》稱讚他「詩清新逸宕，有蘇軾、黃庭堅之遺。文亦頗具唐宋舊格。」(註 125)觀張之翰跋中含意，作為王吉甫老師的文及翁，其詩學所宗，也應該是要超越南宋後期四靈、江湖等派的風格。

《湖州府志》載有如下文及翁小傳一條：

文及翁，字時舉，號本心。綿州人。舉進士，為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寓居烏程（屬湖州府治）。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國亡隱身著書，元世祖累徵不起，閉戶校書，通五經，尤長易數之學。子志仁，字心之，常州路教授。(註 126)

123. 沈季友，《檇李詩繫》，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七集》。

124. 張之翰，《西巖集》，卷 18 〈跋王吉甫《直溪詩稿》〉，頁 7 上。

125. 李岩、余詰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頁 2222。

126. 此小傳引於陸心源，《宋史翼》，卷 34，頁 1480。

此小傳所敘，應當有其依據的資料來源，而非空穴來風。從還可見到的〈韓魯齊三家詩考序〉看來，文及翁對易經、詩經、禮經、和春秋三傳，可說都頗有研究。他在中央政府作官時，曾「授詩藩邸」。(註127)他也說：「余嘗參考三易筭筮法，纂成一卷」。(註128)易數很可能真是他專精的學問之一。可惜我還沒在其他地方找到有關文及翁學易的記載。

尚存文氏著作中，除〈賀新郎〉詞外，本人覺得〈傳貽書院記〉、〈慈湖書院記〉、〈故侍讀尚書方公〔逢辰〕墓誌銘〉三篇散文特別重要和珍貴。兩篇書院記讓我們有機會查看文及翁對於宋代儒學的了解，而墓誌銘是我們要了解宋末有才學如方、文等知識分子所面臨困難的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獻。尤有進者，此墓誌銘還可幫助我們了解並欣賞〈賀新郎〉詞。

〈傳貽書院記〉以如下節開篇：

有宋受命，肇基立極。藝祖皇帝（即宋太祖）一日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識者謂得三聖（即堯、舜、禹）傳心之妙。又一日，問「世間何物最大？」。時元臣（即趙普）對以「道理最大」。識者謂開萬世理學之原。猗歟盛哉！自時厥後，天下設立書院，通今學古之士，彬彬輩出。慶歷（宋仁宗年號，1041-1048）間，詔州縣皆立學，道化大明，儒風丕振。至濂溪周子（周敦頤），建圖著書，微顯闡幽。明道（程顥）、伊川（程頤）二程子，實得其傳。程門高弟，如楊（時）、如游（酢）、如尹（焞）、如謝（良佐），皆天下英才。中原板蕩，載道而南。楊、游、尹、謝諸子，實大有力焉。龜山楊文靖公（即楊時），一傳而羅仲素（從彥），再傳而延平（即李侗）。朱文公（即朱熹）受學于延平，見之師友問答，可考也。文公門人遍天下，中吏（歷？）偽禁。歲寒松柏，疾風勁草，磨涅而不磷緇者，絕無而僅有。于時潛菴輔公（即輔廣），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自祠官報罷，歸隱語溪。題讀書之堂曰「傳

127. 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下冊，卷94，頁1193。

128. 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下冊，卷94，頁1193。近人許肇鼎於其所著《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成都：巴蜀書社，1986）書中說，根據《宋史翼》，卷34，文及翁曾撰《易本義》、《詩傳》、《史纂》、《人倫事鑒》、《歷代編年》等書，均已佚失。其實這幾本書是胡一桂所著，而不是文及翁的作品。在《宋史翼》，卷34裡，胡一桂的小傳，乃在文及翁小傳之後，許氏不察，把這五本書誤認為文氏所撰耳。文、胡兩傳，見陸心源，《宋史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1480-1481。

貽」，蓋將以「傳之先儒，貽之後學」為己任。(註129)

文及翁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用極簡潔的文字，先指出宋太祖對於宋理學之開端所起的可能影響，然後再把宋儒學從北宋中期以後發展至朱子之集大成，其間之來龍去脈，交代得一清二楚。此記的重點在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又稱作道學）。在〈道統圖後跋〉短文開端，文及翁也記述了對於宋儒學之歷史發展的同樣看法：

余曩遊太學，留中都，有作道統圖上徽宸覽者。其圖以藝祖皇帝，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以濂溪、周元公，續周（公）、孔（子）、顏（回）、曾（參）、（子）思、孟（子）之傳，猗歟休哉。洞開殿門數語，真得帝王傳心之妙。《太極》、《易通》等作，真發前聖未發之蘊。其圖已刻石久矣。項君瞍父，聞而知之乎否也？(註130)

從「項君瞍父」一語來看，此跋像是替一位作了「道統圖」的晚輩寫的。而上引一段文字的用意，則是在告訴這位晚輩，以前早就已經有人作過「道統圖」了。文及翁沒有指明「作〈道統圖〉上徽宸覽者」是誰。根據本人初步的考查，上〈道統圖〉者可能是宋末元初的大儒吳澄（1249-1333）。危素（1295-1372）在所作之其師吳澄的〈年譜〉裡，說咸淳三年（1267）當吳氏十九歲時，「作道統圖並敘」。(註131)前已述及，從1262年到1268年，文及翁大部分時間是在中央政府的館閣裡服務。吳澄的〈行狀〉也有如下一段話：

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謂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註132)

129. 徐碩，〈傳貽書院記〉，《至元嘉禾志》，卷25，頁13上-14上。底下引自此文處，不另作註。

130. 傅增湘纂輯，《宋代蜀文輯存》，卷94，頁1195。

131. 吳澄，《吳文正集·附錄》，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第十冊，頁6下。

132. 吳澄，《吳文正集·附錄》，頁26上下。

吳澄用《易經》乾卦之「元亨利貞」四德來描述道統的傳承。〈行狀〉裡的「說」應該就是指〈年譜〉裡的「敍」，而且恐怕不是把後者全文引出，而是只取其中重要的一段。明朝賀士諮所編輯的《醫閭集》卷三〈言行錄〉內有此條：

吳草廬（即吳澄）道統圖說，恐非有道者氣象。豈有十九歲人，便可以道統自任。古之自任者，莫如孟子。然公孫丑疑其為聖人，便深不敢當。豈有不待他人稱己，自以為蓋有不可得而辭者乎？況北方又有一許魯齋，安可謂天下無人？（註 133）

《醫閭集》是賀士諮編輯其父賀欽（1466 年進士）的言行與詩文而成。也許賀欽有我們現在已經見不到的材料依據來認定〈行狀〉所引的「說」就是敍述〈道統圖〉的。如果吳澄的「道統圖並敍」果真為文及翁的〈道統圖後跋〉之所本，則文及翁是把吳澄的「敍」作了一更簡略的摘要。應該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文及翁沒提作此〈道統圖〉者的名字？而作吳澄〈行狀〉者為什麼沒提吳澄認為藝祖皇帝（即宋太祖），是承續了伏羲、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下來的道統呢？也許文及翁認為吳澄的〈道統圖〉「已刻石久矣」，應是眾所周知之事，因此不提其作者名字。吳澄雖然在咸淳六年（1270）在鄉貢中選，^{（註 134）}可是他從來沒在南宋作過官，反而是在 1301 年以後，開始作元朝的官。^{（註 135）}替吳澄作〈行狀〉的人，不提吳澄認為宋太祖承續了伏羲、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下來的道統，想必與這件事實有關。此外，雖然我們不知道〈道統圖後跋〉的寫成時代，根據「已刻石久矣」一語來猜測，或許此跋寫於宋亡很久以後。這也可能是文及翁不提吳澄的原因之一。

關於宋太祖談論「我心」和「道理」兩事，宋朝的史籍也有記述。《宋史全文》卷二，〈宋太祖二〉節，有底下記載：

戊辰乾德六年，春正月乙巳，大內營繕皆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

133. 賀士諮編輯，〈言行錄〉，《醫閭集》，卷 3，無頁數，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集部 6。此書是賀士諮編輯其父賀欽（西元 1466 進士）的言行及詩文稿而成。

134. 吳澄，《吳文正集·附錄》；賀士諮編輯，〈言行錄〉，《醫閭集》，卷 3，頁 7 上。

135. 吳澄，《吳文正集·附錄》；賀士諮編輯，〈言行錄〉，《醫閭集》，卷 3，頁 12 上。

曲，人皆見之矣」。(註 136)

在淳佑年間（1241-1252）舉進士的呂中，曾於其《宋大事記講義》討論此事，有言曰：

以我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光大，如漢高帝。謀慮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註 137)

由此可見，宋太祖續伏羲、堯、舜三聖之心傳之說，在文及翁、吳澄以前，早就有了。至於有關「開萬世理學之原」一點，《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上，〈宋孝宗三〉有記：

己丑乾道五年春……三月戊午，明州州學教授鄭耕進對奏：「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對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屢稱善。夫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註 138)

雖然，文及翁從歷史的角度來陳述宋儒學的發展，其見解並無新穎獨創處；不過他的表達還算簡潔明瞭，且頗能點出宋文化的特色。

寧宗慶元（1195-1200）初，韓侂胄（1152-1207）擅權，指斥朱子倡導的道學為偽學，禁止在省試中以道學取士，並剝奪道學家及他們信徒從政的資格。(註 139)當時道學之徒大都解散了，惟有輔廣能夠「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致力於著書以及教授學者的工作。輔廣罷官歸隱後，努力在地方上傳播儒家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至今語溪之人，薰其德而善良，不知其幾」。從輔廣所遺留下的典範，文及翁下個結論說：「為政之道無他術焉，不擾而已」，尤其那些可說與民最親近的郡守、縣令，更應該能夠「善俗安民」才好。因此，文及翁在記的

136. 無名氏撰，《宋史全文》，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 2，〈宋太祖二〉，頁 1 上下。

137. 呂中，《宋大事記講義》，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第 1 冊，卷 3，頁 1 下。

138. 無名氏撰，《宋史全文》，收於王雲五主編，〈宋孝宗三〉，《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 25，頁 15 上下。

139.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245-248。

結尾強調他寫此記之主要目的是：「揚我朝道學源流之盛，以諗同志。庶學者于善惡之途，正邪之別，義利之判，道心之危微，天理人欲之消長，知抉擇而定趨向焉。不至爲君子之棄，小人之歸。其於國家化民成俗，豈曰小補之哉？」此記的重點正是在倡導儒家化民成俗的教育思想。

根據何忠禮與徐吉軍的簡述，南宋蜀學的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易學發達及強烈的心學傾向兩方面。^(註 140)文及翁是四川人，所以他免不了受了蜀學傾向的影響。關於易學，我們知道文及翁是曾經下過功夫的。可惜他在這方面的著述都沒有流傳下來。文及翁在心學方面的鑽研則可在他寫的〈慈湖書院記〉裡取得印證。此記開門見山就說楊簡（1141-1225，字敬仲，號慈湖）的學問「心學也」。緊接著，他說：

學孰為大？心為大。心之精神是謂聖，不至於聖，曲學也，不大於心，淺學也。一心虛靈其大，無對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管攝於心。若不識心，何以為學？自有天地以後，未有經籍以前，闡道之秘，惟圖與書。河圖中虛，洛書五位，心之本體也。太極此心也，皇極此心也，堯兢兢此心也，舜業業此心也，禹孳孳此心也，湯慄慄此心也，文王翼翼此心也，武王無貳此心也，周公無逸此心也，孔子、孟子操則存此心也，曾子、子思謹其獨此心也。易說心，書傳心，禮制心，樂治心，詩聲心，春秋誅心。故其帝所以為帝，王所以為王，聖賢所以為聖賢，焉有心外之學乎？^(註 141)

在稍後一段中，文及翁說「及翁平生讀書，以本心名齋」，就是說用陸九淵（1139-1192）「發明本心」的論學宗旨裡的「本心」^(註 142)兩字來作他的書齋名字。這表示文及翁是久已多麼地心儀陸象山的學說了。牟宗三先生曾經說過：「象山之學並不好講，因為他無概念的分解，太簡單故；又因為他的語言大抵是啓發語，指點語，訓誡語，遮撥語，非分解地立義語故」。^(註 143)在上引段落裡，文及翁不借

140.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608-609。

141. 袁桷，〈慈湖書院記〉，《延祐四明志》，卷 14，頁 35 上-38 下。底下引用此文不另作註。

142.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593。

143.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

用陸象山的術語（如「心即理也」、「簡易功夫」等），完全用自己的話來述說「心學」的大意。然而，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意思也不外是，「理（記中用「道」字代替）是心的表現，心是萬物根源性的實體，充塞宇宙的萬物之理即在心中，發自心中」。（註 144）往聖先賢的事功，一切經典著作，也全是吾人此虛靈之心所表現創造出來的。我們也可引一兩段陸象山自己說的話來比較一下：

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全集》卷十〈與趙監書〉）（註 145）

古之學者為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其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只是理會此。（《語錄》卷三十五，李伯敏所錄）

（註 146）

文及翁的文字，雖然相當簡短，可說是對於陸象山的話之發揮。其記尾段批評當時的學風，也可看出是跟隨陸象山的看法而來的。如果文及翁對陸象山的思想沒有精湛的研究，他是寫不出這樣深入淺出的文字的。

介紹了「心學」的大意後，文氏再記述楊簡的三項成就。首先，他提到楊簡還在太學當學生時，已能晏坐反觀而悟道，「忽見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一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自是一片。」顯然在未見他的老師陸象山以前，楊簡已靠自己反觀內心的功夫，達到了相當高的悟的境界了。但是這個悟道的經驗還只局現於見的層次。其次，文及翁再記述楊簡親自跟隨陸九淵後，有一天，他「發本心之問」，而他老師舉是日「扇訟是非以對」，導致楊氏「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註 147）

144.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1。

145.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18。

146.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52。

147. 《象山先生年譜》於三十四歲年下也記載此事：（楊簡）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

這次的經驗，看起來就很像禪師所說的透徹之悟了，與前次的悟道不同。經過他老師的指點，楊簡已從只是見的層面深入，而了悟作為宇宙萬物根源性的實體之心，本來就是清明、無始末、無所不通的。達到這個精神境界，當然楊簡也就能「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此本心之）變化」了。第三，除了指出楊氏為人「忠信篤敬」，也認為其經典注釋和其他遺文訓語，都是他精神的自然流動。既然文及翁自己也「治詩賦」，因此也就特別欣賞楊氏在慈湖的一些詩歌創作，說「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洒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浴沂詠歸」就是我前面提出討論過的曾點之樂。楊簡正是文及翁衷心佩服崇拜的人物，所以他說「於先生片言隻字，收拾殆盡，知好之樂之，又若心交而神遇者。」以上三點，可說把楊簡一生的成就與文及翁本人為什麼崇拜他，交代得很清楚，令人一目了然。結束書院記前，他痛批世風之敗壞，學人大都「不知心為何物」，只知追求功名富貴，不知修養虛靈之心，只以記誦、出入口耳之學為學，反而以心學為非。文及翁自己說此記作於咸淳九年（1273）的「良月吉日」，所以我們不知道此記寫成的確切月日。我們知道咸淳九年正月九日元軍已經攻破了樊城，而再過一個月，守襄陽的呂文煥也以城降元。這兩個南宋的重鎮一淪陷，江南也就不容易保了。可是我們在〈慈湖書院記〉裡看不到任何對於緊迫時局的反映。這也許是因為此記是為紀念去世已經快五十年的楊慈湖而寫的緣故，所以其重點則是在表揚心學的教育思想。

前面已經提到，〈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是現在尚存很重要的一篇文及翁的文章。全文很長（共 4111 字），因為作者直接大段地引用方逢辰上理宗和度宗的奏疏。今傳方逢辰撰的《蛟峰文集》附有文及翁的〈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和元初黃縉所撰的〈蛟峰先生阡表〉。雖然黃縉自稱「某與公曾孫道壑，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之詳，乃擇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壑，俾刻石為阡表，庸備史之闕文」，（註 148）可是當我們把這兩篇文章仔細比較時，就能看出文氏墓誌銘乃為黃氏

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見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戴山》，頁 19。

148. 黃縉，〈蛟峰先生阡表〉亦收入方逢辰，《蛟峰文集·外集》，卷 3，頁 20 上-30 上。此後引文及翁的〈故侍讀尚書方公（逢辰）墓誌銘〉和黃縉的〈蛟峰先生阡表〉處，均取自此書，不另作註。

阡表之所本。〈蛟峰先生阡表〉寫的比較簡潔而容易讀（全文只有 3260 字，比墓誌銘少了 851 字），但是所錄方氏奏疏之順序與內容，殆全取自〈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只是文字偶有出入或較簡略而已。

文及翁和方逢辰曾於景定（1260-1264）晚期和咸淳（1265-1274）年間，一同在中央政府作過官。文及翁在墓誌的尾端引司馬光（1019-1086）說「吾與范景仁，兄弟也，特姓不同耳」三句話來表示他和方逢辰的關係也像兄弟一樣的親密。他又在銘中說「我之於公，志同道合。熙明啓沃，相勉報忠」，以與此三句相應。此篇墓誌銘寫的非常詳細，從方氏漢朝時的祖先寫起，記載方逢辰本人作中朝官、地方官的言行、政績以及他的爲人和著述等，一直寫到他的子女和孫子輩爲止。墓誌銘的中心部分是方逢辰上給理宗和度宗的奏疏。透過文及翁對於其密友方逢辰一生的記述，我們能體會出在宋末作朝廷官員之困難。

文及翁特別強調方逢辰的鯁直敢言的個性。他報導說，理宗就是因爲方逢辰在策試時「所答敷陳鯁亮」，才擢他爲進士第一，並把他名字從「夢魁」改作「逢辰」。墓誌銘所記第一個奏疏是方氏剛於淳祐十年（1250）考中進士，人還在期集所時，呈上去的。當時，理宗「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方逢辰即叩闕上書，其中有言曰：「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諍之；貨臣聚斂，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方氏趁雷變的機會上奏，說明開放言路之重要，並指出當時朝廷正面臨一些嚴重問題，而大臣無人建議解決之策，均作備位充數的「具臣」。此疏頗獲理宗賞識，因此他就被「補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作一個地方小官吏。墓誌銘第二次提到方逢辰抗疏是在寶祐元年（1253），在他奉召赴秘書省任正字以後。當時海州喪師，而兩淮制置使賈似道卻向朝廷報捷，並且得到理宗的獎諭。方逢辰上書有曰：「海州之敗，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徒以一去，恐朝廷直欲以敗爲勝，道路傳播，莫不羞之。今曲徇其請，又詔獎諭。豈陛下不知而受其欺耶？」方氏之取怒於賈似道就是從這一疏開始的。此後，墓誌銘又節引了五、六個奏疏，大部分是奉呈給理宗的。這些奏疏，有批評皇帝左右小人、奸人竊弄威福者，有勸理宗不要受奸人的影響而讓財貨聲色侵飾其心者，有談邊備者，有論宦官者，有論爲人君者不應使天下畏己者等等。

方逢辰的奏疏大都直率懇切，有時用辭還很激烈，使皇帝看了很不高興。如當御史洪天錫劾宦官董宋臣、盧允升，「不行而去」，方氏抗疏有說：「臺臣劾二豎，欲爲國家早去厲鬼，非有膏上肅下之難，而陛下不行其言，豈陛下自愛其國，反不如愛二豎之甚乎？……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此曹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文及翁說這次抗疏，「言極激烈，上不悅，公遂稱疾求去。」開慶元年（1259），姦臣丞相丁大全被罷逐，理宗起用吳潛作丞相，方逢辰也被朝廷以著作郎召，並於次年任用作代理尚書左郎官。因吳潛爲人太鯁直，理宗很快就不喜歡他，而逐漸與賈似道親密起來。不久以後，「上與賈密，往復外廷不得預聞。以宰相不知邊報爲潛罪，夜半片紙，忽從中出，吳潛除職與郡，中外惴惴。」於是方逢辰又上一書，大意言朝廷行事用人多非天下之所同好，而多是天下之所同非。理宗問他所進之言是爲誰而發，方逢辰以「臣疏不敢直指，惟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作答。當時皇上雖然首肯，可是往後並沒有改變他的行爲。吳潛被罷去後，賈似道即入相，而方逢辰也遭臺臣議論而被罷職。此後，方逢辰是在度宗登位以後才再被起用，不過賈似道仍一直在朝廷擅權。作過幾年地方官以後，方氏於咸淳五年（1269）受除權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咸淳七年（1271），丁母憂，方逢辰就離開中央政府的職務。以後一直到德祐元年初，朝廷曾數次再徵召他，他都辭不就。文及翁特別指出，「賈相國十六年，而公屏居十餘年」。黃縉把文及翁這兩句話改作「蓋似道柄國十六年，公屏居十年」後，加了評語說：「諫則不行，言則不聽」，把一個事無可爲的情況表露無遺。在賈似道掌權的時期，個性鯁直如吳潛、方逢辰等人，確實很難在朝廷中生存。幸好方氏有自知之明，且知難而退，所以沒像吳潛一樣，被賈似道排擠，終被流竄外州而死。比起文及翁，方逢辰也幸運得多。先是丁母憂而辭官，後來在德祐元年受召時，父親老而有病，因此能夠「以父命辭」，而且不久父親又去逝，他又可名正言順地丁父憂，不再出來作官了。如前所述，文及翁雖曾屢次求祠祿，但是都得不到上面的批准。文及翁最後還甚至在元兵將進攻南宋首都時，以一個剛升任不久的「執政」逃遁，而受歷史的責備。

在結束這一部分前，我還要討論一下〈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所記述的一份奏疏。此疏是在寶祐四年（1256）上給理宗的。方逢辰上疏的原因是「時閹宦

導上以土木湖山，工役大興。」理宗於寶祐三年命宦官董宋臣主持佑聖觀的建造；董宋臣不但把佑聖觀造得富麗堂皇，而且還建了梅堂、芙蓉閣、和香蘭亭來供皇帝享用。(註149)方逢辰在同一疏裡，不但批評皇家在此時大興土木之不當，而且也極言備邊的重要。他說：

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之所築者，金城鐵壁。我之所築者，土妖血山。彼之所築者，奪我之地為之。我之所築者，奪民之地為之。……以必爭之規模而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而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大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猶有一線河也。今（元人）乃涉河而築浮光，光乃吾戶內，若其屯於斯，耕於斯，生聚教訓於斯，則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壁，而坐為禁制，不得動矣。為吾之計，當勉諭淮閫，盡力以爭浮光，毋使彼得，以久其耕，而牢其巢，則兩淮可以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而巢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擇荊之猛將，責之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以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

黃縉把開頭論彼、我之所築者數句與論備邊一段當作來自兩疏，而文及翁則只加「又極言備邊之事」一語，似乎認為係屬同一疏。今從文氏。論彼、我之所築者一段雖短，其文字卻至為銳利痛切。方逢辰把敵人奪取南宋土地修築金城鐵壁，與理宗在杭州「奪民之地」來大興土木建造供自己享樂的花園樓閣，拿來作對比。(註150)誰將在兩國敵對競爭中成勝利者，不言而喻。黃縉在這句話後加了如下非常貼切的評語：「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雖然文及翁未加任何案語，他肯定是要其記述本身讓讀者領會，南宋君臣之沉酣於湖山歌舞，並不是

149.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356。

150. 墓誌銘中，文及翁以「金城鐵壁」和「土妖血山」對舉。「土妖」不知是指什麼？而「血山」則無疑是指庭園裡的「假山」而言。此點可由如下取自《宋史·姚坦傳》的一段得到證明：「……坦性木強固滯。王嘗於邸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樂飲，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宋）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見脫脫等撰，《宋史》，卷277，頁9418。

對付強敵壓境的好辦法。剩下引自疏中的大段話，也充分表現方逢辰的遠見。

公元 1251 年六月蒙哥繼任為蒙古族的大汗後，任命四弟忽必烈主管漠南漢人地區的軍、政事務。^(註 151)忽必烈隨即改變以往單純破壞、掠奪的戰略，開始在從四川到淮東一線與南宋接壤的占領區內，修築城堡，部署重兵，實行屯田，以作最後消滅南宋的準備。^(註 152)南宋也採取了一些因應的措施，如「不斷襲擊蒙軍，斷絕蒙軍糧道，使其無法在沿邊築城固守」等，同時「加緊在兩淮的戰略要地建築城堡、山寨，墾荒屯田。」^(註 153)這些措施有許多是賈似道的功勞。方逢辰的建議比這些措施還要更進一步，要把蒙古人驅逐到淮河以北，取回敵人占領地，使其不在我境內築城、耕作、以及生聚教訓，也讓南宋多了一條淮河作保護。無可否認，方逢辰的建議比南宋朝廷所採用的措施要高明得多。文及翁在引文後加了幾句感歎話：「公此疏，真救國之活劑也。奈何不見聽用，以至於亡。人耶？天耶？」。黃縉則把文及翁的話稍稍改成：「識者謂公此疏，真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重爲之太息焉」。黃縉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他所謂「識者」必指文及翁無疑。

文及翁的〈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寫於至元三十年（1293），離南宋滅亡已經十四年了。他替亡友所寫的墓誌銘，除了記述方逢辰一生言行、事蹟、與成就外，也表達了他對南宋所以衰亡的看法。根據這篇長文的記述，南宋衰亡的主要原因，是君臣玩細娛而不圖大患，朝廷讓賈似道這種人擅權，而不能採用像方逢辰這樣有真才幹、真遠見的人及其救國的活劑。文及翁所描繪出來的是一幅朝廷未能圖治、志士無能爲力的景象。他反映於此墓誌銘的看法與〈賀新郎、遊湖詞〉和《錢塘遺事》所表達的看法，是完全相應的。

四、解讀文及翁的〈賀新郎〉詞

總上所述，無論從〈賀新郎、遊湖詞〉出現於《古杭雜記》和《錢塘遺事》的情況、或從文及翁的才學和他對於國事的看法來推測，本人認為該詞很可能就

151.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341。

152.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341。

153.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頁 343。

是他的作品。可是因無可靠記載，我們不能判斷究竟此詞是他及第以後與同年遊西湖而作，或是他自己遊西湖有感而作，再被後人附會且加上了與同年遊湖的故事而流傳至今。如果詞之寫成屬於後者，也應該是他中進士以後、開始作官以前，或在「仕宦未達時」所作，「下距宋亡不過二十餘年」。^(註 154)現在我們就依照這些假定，先把此詞本身仔細讀過，然後再來討論其在南宋詞史和文化史上的意義。

許多現代學者討論文及翁的〈賀新郎〉時，都附了詞題：「遊西湖有感」。^(註 155)這個詞題的來源可能都是清初朱彝尊（1629–1709）編的《詞綜》。《說郛·古杭雜記》不列任何題目，而《錢塘遺事》卷一錄文及翁賦〈賀新郎〉的故事前有「遊湖詞」三字。這只是該條的題目，而非〈賀新郎〉的詞題。雖然朱彝尊很可能是出於己意而加了詞題，可是詞之內容卻是可用「遊西湖有感」五字來描述的。

開頭「一勺西湖水」句算一韻拍（strophe），獨立構成一完整的意象，不過其文意卻與第二韻拍的「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兩句緊密相連。（通觀全詞，其結構是每兩韻拍組成一個意義完整的單元。）勺是古代量器名。《孫子算經》說：「量之所起，起於粟。六粟爲一圭，十圭爲一撮，十撮爲一抄，十抄爲一勺，十勺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斛。」所以用「一勺」來形容西湖，極言其小。^(註 156)如果《古杭雜記》和《錢塘遺事》所記的故事屬實，文及翁是以「一勺西湖水」開門見山地直接回應同年的不太友善之「西蜀有此景否」一問。文及翁極言西湖之小，一方面是要矮化杭州的湖山勝概，而另一方面則要爲後文寫南宋君臣偏安江南、醉生夢死的過日子作準備。高宗於 1127 年渡過長江，於 1138 年定都臨安，下距此詞之寫成，已經有一百多年了。此處用百年的整數來約略言之。正如胡雲翼和顧復生的解釋，首二韻拍說：南宋建都一百年來，統治者一直在這小小的西湖上享受歌舞酣醉的生活，隱寓他們把收復北方廣大國土的

154. 這是夏承燾提出的一個可能。見夏承燾，〈文及翁的西湖詞〉，《浙江日報》（杭州），1962 年 2 月 28 日。承美國加州大學大衛士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歷史系博士班學生吳玉廉小姐幫忙取得此文，特此致謝。

155. 例如，下面討論文及翁詞的著作都附有此題：夏承燾，〈文及翁的西湖詞〉；胡雲翼，《唐宋詞一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148；唐圭璋主編，《唐宋詞鑒賞辭典》（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1221；此辭典所錄論文及翁之文爲顧復生撰。《全宋詞》指明詞取自《錢塘遺事》卷 1，然而詞題卻作「西湖」。見唐圭璋，《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73），第五冊，頁 3138。

156. 《辭源》，頁 710。

大業置之度外。(註 157)

接下去「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兩韻拍把這層隱含的意思直接抒發出來。此兩韻拍首句，現代學者（包括陶爾夫、劉敬圻兩先生，而唐圭璋除外）都讀作「回首洛陽花石盡」。其最終來源大概又是《詞綜》；不知朱彝尊從何處取來那個句子。也許因為北宋洛陽有很多名園，而徽宗曾派官員到各處去搜採奇花異石，運回汴京去造艮嶽，所以朱彝尊逕自把「花世界」改作「花石盡」。這裡我們仍以較早、見於《古杭雜記》和《錢塘遺事》的本子為準。洛陽用以代指北宋的故都汴京。〈黍離〉是《詩經、王風》中的一篇，哀歎西周都城鎬京的舊址上長滿了黍稷。(註 158)「新亭墮淚」用的是劉義慶《世說新語》的典故。《世說新語·言語》記載說：「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在今南京市南），藉卉飲宴。周侯（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淚。惟王丞相（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註 159)此二韻拍說，遙想舊都汴京這個花花世界，早已變成野煙繚繞、黍稷離離的境地，當然不能跟繁華的臨安相比。令人悲哀的是，目前看不到有人像東晉南渡的士人，爲了西晉的滅亡，河山之破裂而落淚，更不必談會有人還像王導一樣，想恢復神州了。

詞上片以「簇樂紅妝搖畫艇，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作結。首句描寫眼前景，給讀者一種極為強烈而又艷麗的視、聽覺印象。「簇樂」寫多種不同的樂器在合奏；(註 160)「紅妝」是以女人用的化妝品來替代打扮漂亮的歌女、樂伎，所謂以部分代全體的換喻法（synecdoche）；「搖畫艇」，或作「搖畫舫」，則指裝飾華麗的船在湖中搖蕩。看到這樣充滿聲色的景象後，作者透過詞裡的說話人（lyric speaker）問說：那班湖中取樂人裡，還有誰能像晉朝的祖逖率兵北伐，於中流擊楫發誓說，「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註 161)結拍繼續逼問：什麼時候可以清洗掉千古不能忘的仇恨呢？這仇恨當然是指徽、欽二帝被擄和失去中原半壁江山之恨。此兩問都用反詰語（rhetorical question）的形

157. 胡雲翼，《唐宋詞一百首》，頁 148；唐圭璋主編，《唐宋詞鑒賞辭典》，頁 1221。

158. 王筱芸，《增訂注釋全宋詞·第 4 卷》（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頁 118。

159. 唐圭璋主編，《唐宋詞鑒賞辭典》，頁 1222。

160. 胡雲翼，《唐宋詞一百首》，頁 150。

161. 王筱芸，《增訂注釋全宋詞·第 4 卷》，頁 119。

式出之，讓讀者只能從中得到一個答案，即目前找不到像祖逖那樣有堅決意志的人去收復失土。

過片「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礪溪未遇，傅巖未起。」三句轉從自己（即詞裡之說話人）寫起，連用了三個典故。《後漢書·范滂傳》說：「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註 162）}「礪溪」用姜子牙釣於礪溪（在今陝西寶雞縣東南）遇到周文王被起用的傳說；「傅巖」用殷高宗於傅巖（在今山西平陸縣）碰到在那兒築牆的傳說而舉以為相的傳說。^{（註 163）}此三典故都被用來作比喻自己的隱喻（metaphor），把自己比作范滂，有把混濁的天下澄清的大志，可惜卻沒有像周文王和殷武丁那樣的賢君來發掘他。「礪溪」和「傅巖」兩典故也同時可作當時跟作者一樣「未遇」、「未起」之人材的比喻。前面曾引過姚勉為及第而作的〈賀新郎〉詞之序。其中有：「以為男兒志，……必志於致君澤民而後可。……夫以天子之所親擢，蒼生之所屬望，當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負之哉？」姚勉這幾句話的含意正與文及翁詞過片三句所表達的意思一致。從詞與信看來，這兩位同年以狀元和榜眼及第的年輕傑出人材，都有效忠報國的志願。可是，姚勉在〈回文本心榜眼〉信中說：「大抵今日上下，只以北兵未退為憂，而不以賢者未進為慮。所謂元氣壯則無外邪，直以此等語為迂闊，殊不知豈有天下賢者聚朝廷，而亡人之國者哉？……尊年魁自合經筵、諫坡中人，小亦當且儲諸學館。」^{（註 164）}這信是景定元年（1260）年初姚勉應召去朝廷任正字職時寫的，而文及翁也在此不久前入吳興節度使的幕府，距他們考中進士已經六、七年了。「未遇」、「未起」的怨言是在此之前發的。

「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二韻拍承上賢人不被用一主題而直接論述當前國家所處的局勢。朝廷不重用人材，危急的國事只依靠如衣帶一樣狹窄的長江而已，好像大家都認為江神足以擋住強敵、保衛國家。全詞以如下數句結束：「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孤山林處士」是北宋初期隱居西湖孤山二十年的林逋（967-1028）。林隱士喜愛梅花，於所居種很多梅，也養鶴，因此人稱他為「梅妻鶴子」。文及翁借用

162. 王筱芸，《增訂注釋全宋詞·第4卷》，頁119。

163. 王筱芸，《增訂注釋全宋詞·第4卷》，頁119。

164. 姚勉，《雪坡集》，卷30，頁15上下。

林逋來影射當時自命清高、逃避現實、不管世事的士大夫。夏承燾曾極正確地指出：「這首詞寫了（也許『影射了』比較恰當些）當時社會上四種人物：（一）是紙醉金迷的貴族官僚。（二）是有抱負的知識分子報國無路。（三）是南宋小朝廷的統治者，不重視人才，不提拔國士。（四）是一般逃避現實的文人，寄情花草，自命清高，置國事於不顧」。^{（註 165）}在短短一百一十六字的篇幅裡，文及翁把社會上四種屬於高階層的人物都概括了，堪稱技巧高明。既然四種高層人物中唯一尚能挽救局勢的志士得不到機會去施展才華，國勢顯然是岌岌可危了。收束全篇的「天下事，可知矣」六個字，非常有力，可說是「在極端悲憤之中，又發出了無可奈何的浩歎。」^{（註 166）}

在討論文及翁〈賀新郎〉的藝術技巧時，夏承燾指出詞中所用的「對比手法」：「以『歌舞』、『酣醉』與『煙渺黍離』作對比，以『簇樂紅妝搖畫舫』與『中流擊楫』作對比，以『自負澄清』的志士與倚仗江神的統治者（還有自命清高的文人）作對比。在這許多對比中，揭露了當時政治（還有社會）上的矛盾。」^{（註 167）}本人要特別補充的是，詞中的諸多對比，除了揭露當時政治、社會上的矛盾外，也體現了南宋慢詞的新美典（aesthetic mode）。有關南宋慢詞的新美典，業師高友工先生曾提出過精闢的見解。因篇幅所限，在此我無法把高老師的洞見詳細敘述；有興趣者，可參看高先生〈小令在詩傳統中的地位〉一文及拙作〈南宋長調詞中的空間邏輯——試讀吳文英的《鶯啼序》〉。^{（註 168）}簡單地說，高老師指出，「長調在它最完美的體現時，是以象徵性的語言來表現一個複雜迂迴的內在的心理狀態。」^{（註 169）}長調是在南宋時才完成其最完美的體現的。高老師用「空間性的圖案」（spatial design）來稱呼南宋描寫心境的複雜長調結構。所謂空間性圖案結構，就是寫詞不按有先後的時間性秩序（temporal continuum），而靠空間的方位分布（spa-

165. 夏承燾，〈文及翁的西湖詞〉。

166. 唐圭璋主編，《唐宋詞鑒賞辭典》，頁 1223。

167. 唐圭璋主編，《唐宋詞鑒賞辭典》，頁 1223。

168. 高友工，〈小令在詩傳統中的地位〉原刊於《詞學》第 9 輯，現已收入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8），頁 265-283。林順夫著、張宏生譯，〈南宋長調詞中的空間邏輯——試讀吳文英的《鶯啼序》〉，《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附錄 2〉，頁 190-209。

169. 高友工，〈小令在詩傳統中的地位〉，林順夫著、張宏生譯，〈南宋長調詞中的空間邏輯——試讀吳文英的《鶯啼序》〉，《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頁 282。

tial configuration) 來組織字群、段落、和情節的。空間性的圖案是根據平行、橫向、並列、互應等原則，把一首詞的組成成分整合起來的。文及翁的〈賀新郎〉是描寫他遊西湖時內心所呈現的一個複雜心境——這個複雜心境就是他對於國家衰亡的預感。而這個心境是透過上、下片幾個意思完整的單元（每單元各含一或二韻拍）間的對比、並列、和互應而表達出來的。文及翁的〈賀新郎〉還含有一個南宋詞的特徵：多典故的運用。並不太長的一首詞就用了七、八個典故。這些典故被文及翁取來作為他自己內心體驗的象徵。陶爾夫和劉敬圻說：「詞中把抒情、敘事、寫景、詠史四者結合在一起，進行綜合對比，極大地增強了譏刺時弊的現實性。」^(註 170)這是對於此詞一個頗為中肯的總評。

五、文及翁〈賀新郎〉詞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

文及翁的〈賀新郎〉在南宋詞史中有其不可抹煞的重要地位。在結束本文以前，我們討論一下此詞在中國文化史中是否也有其特殊而又重要的意義。如前第一部分所述，從目前可見的材料來判斷，文及翁賦〈賀新郎〉詞及其軼事最早記載於元時刊行的《古杭雜記》。隨後宋遺民劉一清把詞與故事原原本本地採入其所編撰的《錢塘遺事》裡。根據《四庫全書提要》，《錢塘遺事》成書後，「世無刊本，傳寫頗稀。」不過，陶宗儀《說郛》也從《錢塘遺事》選載了數條，則他曾看到傳寫本無疑。入明朝以後，尤其在第十六世紀，文及翁賦〈賀新郎〉詞及其軼事也被記載於一些地方志與說部書裡。陸楫（生卒年不詳）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編成的《古今說海》卷一百五所錄，其文字與《古杭雜記》和《錢塘遺事》全同，只漏了「百年歌舞」一句。^(註 171)田汝成（嘉靖年間〔1522-1566〕進士）所撰《西湖遊覽志餘》（附錄於《西湖遊覽志》）卷二十三所錄，其文字與《古杭雜記》和《錢塘遺事》也大致全同，也漏了「百年歌舞」一句，於首句「蜀人文及翁」前加「宋時」兩字，而且詞中「江神堪恃」句作「波神堪恃」。^(註 172)因為文及翁是四川人，所以其〈賀新郎〉被錄入周復俊（1550 進士）的《全蜀藝文志》，及曹學佺（1574

170. 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頁 417。

171. 陸楫，〈說略庚集·古杭雜記〉，《古今說海》（臺北：廣文書局，1968），第 3 冊（共 4 冊），頁 3 上。

172.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上海：中華書局，1958），卷 23，頁 409。

-1647) 的《蜀中廣記》。周復俊只錄詞而不提故事，而曹學佺則除改「蜀人文及翁」為「文及翁蜀人」及「江神堪恃」句作「波神堪恃」外，還於條末加「此即江南所謂煞風景也」一語。文及翁賦〈賀新郎〉其詞、其軼事之被採錄於詞選、詞話裡，是入清以後的事情了，如潘永因（明末清初？）的《宋稗類鈔》，朱彝尊（1629-1709）的《詞綜》，徐鉉（1636-1708）的《詞苑叢談》，和沈辰垣（十七至十八世紀）於1707年編的《御選歷代詩餘》等。關於此詞及其背後故事的流傳，以上這些記載給我們提供一些梗概。

對於我們要探討的問題，除《錢塘遺事》外，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西湖遊覽志餘》最為重要。關於田汝成書，《提要》說：

……是書雖以遊覽為名，多紀湖山之勝，實則關於南宋史事者為多。故於高宗而後，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志餘》二十六卷，則摭拾南宋軼聞，分門臚載，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盡有關於西湖。故別為一編。例同附錄。蓋有此餘文，以消納其冗碎，而後本書不病於蕪雜，此其義例之善也。惟所徵故實，悉不列其書名，遂使出典無徵，莫能考證其真偽。是則明人之通病。（註173）

《西湖遊覽志》和《錢塘遺事》一樣，全不注明材料之出處，使後人用此二書時，不無遺憾。《西湖遊覽志》卷二有如下一條：

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無復新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又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經，士庶往臨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觀此，則宋時偏安之計，亦可哀矣。是以論者以西湖為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吳也。張至道詩云：「荷花桂子不勝悲，江介年華憶昔時。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誤世終無策，庾信哀時尚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恨是西施」。（註174）

173. 李岩、余詰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頁856-857。

174. 李岩、余詰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頁14。

林升的七絕和張至道（南宋後期、元初人）的七律，《錢塘遺事》沒有引錄，而有人題白塔橋一絕則錄於該書第一卷〈題白塔橋〉條下，有條目而無說明。在其編撰的書中，記錄或引述詩詞時，劉一清和田汝成都對這些作品所影射的史事，以及其所表達對於時事、時人的觀感，特別感興趣。田汝成所引三詩，以林升七絕最久為人所傳誦。此首與題白塔橋詩，同是在譏諷南宋人耽樂杭州的湖山歌舞而養成的偏安心態。張至道的詩，顯然是作於宋亡後，因為他用「不勝悲」、「憶昔時」、「六龍移」（六龍指皇帝車駕用的六匹大馬）等語句，而且把西湖比成致使吳國覆滅的西施。首句包含了典故。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記載：北宋真宗（998-1022）時，孫何曾「帥錢塘」，柳永作〈望海潮〉送給他。其詞曰：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註175）

羅大經也記載了一件傳聞：當柳永詞流播以後，金主完顏亮聞歌，非常羨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於是乃下決心渡江南侵。他接著寫道：

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羅大經的整段記載是《鶴林玉露》卷一的第二條。^{（註176）}張志道的「莫向中原誇絕景」句也是照應柳詞末兩句來說的。劉一清把《鶴林玉露》卷一此條全部錄入《錢塘遺事》，給它〈十里荷花〉的題目，又於條尾加「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

175. 羅大經，《鶴林玉露》，頁1。

176. 羅大經，《鶴林玉露》，頁1-2。

云：『依依煙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註 177)數語，以說明羅詩末句的典故。

田汝成所引錄的三首詩，以及謝處厚和羅大經的詩，都可以看作是用詩歌的形式表達出來的一種「文化批評」(cultural criticism)，即對於一種特別的文化現象和行爲、生活時尚的批評。此處批評的對象，是南宋士大夫流連於杭州湖山之清麗和歌舞嬉遊之樂，而忘記了被胡人占據的中原。下面這首陳人傑(1217-1243)作的〈沁園春〉也可算是一篇這類文化批評的好例子：

南北戰爭。惟有西湖，長如太平。看高樓倚郭，雲邊矗棟，小亭連苑，波上飛甍。太守風流，遊人歡暢，氣象邇來都斬新。秋千外，剩釵駢玉燕，酒列金鯨。人生。樂事良辰。況鶯燕聲中常是晴。正風嘶寶馬，軟紅不動，煙分彩鴻，澄碧無聲。倚柳分題，藉花傳令，滿眼繁華無限情。誰知道，有種梅處士，貧裡看春。^(註 178)

在這首詞裡，陳人傑沒有直接寫出批評，而用短短首拍三句與剩下描述「西湖歌舞幾時休」的長段作對比，效果既奇特又強烈。陳人傑〈沁園春〉的寫成，下距文及翁〈賀新郎〉的寫成，至少要有十年。他雖看不慣杭州人耽溺湖山歌舞嬉遊的生活時尚，還沒有覺察到這將導致國家的衰亡。文及翁詞的可貴就在於它深刻地抒發了作者對於國家衰亡的預感。

羅大經和田汝成，只在他們的書中偶爾引錄一些詩詞，來作他們自己的文化批評。劉一清編撰《錢塘遺事》時，南宋君臣、士大夫之耽溺湖山歌舞以至於亡國，則變成其書之中心主題。前已提出，《錢塘遺事》是一部聚焦記錄南宋亡國的記述文學(narrative literature)作品，獨特而珍貴。該書雖係廣採宋人說部片段而成，全書實是有其頗爲嚴謹的整體架構的。從卷一至卷九有一個時間先後的順序作間架，即從高宗定都杭州起，到宋謝太后與嗣君福王率隨行宰執官僚、在上都向忽必烈作初見進貢禮儀爲止。《提要》已經指出，第九卷「全錄嚴光大所記德祐丙子(1276)祈請使行程」。^(註 179)嚴光大是「日記官」。他所記行程止於初見忽必烈作進貢禮儀，因爲宋朝已實質滅亡了。從卷一到卷九，有關南宋史事的記

177.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頁21-22。

178. 王筱芸主編，《增訂注釋全宋詞·第四卷》，頁69。

179. 李岩、余喆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頁720。

述，都是按照時間先後而安排的。這頭九卷中有關高孝光寧四朝的記述非常簡略，占不到兩卷的篇幅，可是秦檜、韓侂胄、史彌遠等之擅權卻沒被遺漏。卷二以宋元合作夾攻金國作結束；當然金一亡，唇亡齒寒，南宋就與強敵蒙古人交界了。剩下的七卷都記載理宗、度宗以後一直到嗣君北狩的事情。第十卷載南宋的進士科目條格故事，其目的，正如《提要》所說，要讀者了解宋朝廷養士極其周詳，可是朝臣「自祈請以外，一籌莫效」。(註 180)這一點當然是因為南宋士大夫只知「湖山歌舞，視天下事於度外」(註 181)的原故。

南宋君臣、士大夫之耽溺湖山歌舞以至於亡國這個主題，劉一清在《錢塘遺事》開篇的題識裡就已經提出來了。此後，劉一清多次引詩詞、傳聞或自加按語來提醒讀者不要忽略這個主題。光是卷一，此主題就被重覆地寫了好幾遍。已經提過的〈十里荷花〉、〈遊湖詞〉、〈題白塔橋〉三條都與此主題直接有關連。〈冷泉亭〉條曰：「冷泉亭，正在靈隱寺之前。一泓極為清泚，流出飛來峰下，過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題詩曰：『一泓清可浸詩脾，冷暖人情祇自知。流去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註 182)此條之被收入全在「流去西湖載歌舞」這一句詩。〈蘇隄趙隄〉條說明蘇軾守杭時築隄的目的不是為了「遊觀」，而是遏水深的地方為湖，使水淺的地方變成農田——言下之意，西湖是到了南宋以後才完全變成遊觀的對象的。(註 183)最後，首條〈天目山識〉和末條〈格天閣〉都提到秦檜的（一德）格天閣（後來高宗在其故基上造德壽宮），都是緊扣主題不放。在其他卷裡，劉一清就不再這樣聚焦地描寫此主題了。可是他還是在緊要處不忘主題。如卷五有接續的兩條，題作〈似道專政〉和〈半閒亭〉，都與賈似道有關。前條寫咸淳丁卯（1267）賈似道任平章軍國重事以後，

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車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

180. 李岩、余詰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

181.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 1，頁 17。

182.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 1，頁 26-27。此條所引是南宋林稹（字丹山）的題詩。見張岱撰、孫家遂校注，《西湖夢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注 12，頁 77。《西湖夢尋》裡〈冷泉亭〉條下有「張公亮聽此水聲，吟林丹山詩：『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言此水聲帶金石，已先作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等句。見此書，頁 76。所引二句，文字與《錢塘遺事》稍異。而孫家遂注 12 所引，又與此二引稍有不同：「一泓清可浸詩脾，冷暖年來祇自知。流向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見同書，頁 77。

183. 劉一清，《錢塘遺事》，頁 30。

署，宰執署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翁應龍。諷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戶幾漕處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專。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後葉夢鼎、江萬里皆歸田。軍國重事，似道於湖上閒居遙制。時人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註184)

「半閒」是賈似道西湖府第裡一個扁亭的名字。有佞人送給賈似道一首〈唐多令〉詞，大為稱賞「半閒」之意，其結尾云：「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引詞後，有如下按語：「夫似道為國之重臣，而其可以閒中消日月耶？天下烏得不壞！」(註185)又卷六還有一條，題作〈戲文誨淫〉，也是記敘賈似道放蕩淫逸的生活。此條以「湖山歌舞，沉酣百年。賈似道少時挑達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間或飲於妓家。」幾句作起。這幾條有關賈似道之記載，大概免不了有誇張之處，不盡屬實。然而劉一清以之來喚起讀者注意其書主題之用意則非常明顯。這些記載是擺在「元兵渡江」、「劉整叛北」、「彗星之變」、「襄陽受圍」、「襄樊失陷」等語境中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其中味」的。不能忽略，載南宋的進士科目條格故事的第十卷有如下一段：

越三日，局（即狀元局，又稱期集所）中職事官，下湖運司作二大舟。局中連三狀元（即狀元、榜眼、探花三人），七、八十人，分坐於兩舟。酒數行，借張侯之真珠園散步，侯家亦有餽焉，其例也。薄暮，艤舟於玉壺園而竟席。(註186)

這是為了慶賀和獎勵中進士頭七、八十名所安排的特別節目。吳自牧在其《夢梁錄》卷十九〈園囿〉一節開頭說：「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兩峰，亭館臺榭，藏歌貯舞，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註187)由此可見，園林是當時貴族、大官僚、以及有錢的人，日常過著娛樂不斷、優雅安逸的生活所必需有的。同節稍後，他又提到：「雷峰塔寺前有張府真珠園，內有高寒堂，極其華麗。」(註188)

184.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5，頁115。

185. 劉一清，《錢塘遺事》，頁116。

186. 劉一清，《錢塘遺事》，頁236。

187. 吳自牧，《夢梁錄》，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295。

188. 吳自牧，《夢梁錄》，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

周密在《武林舊事》卷五〈湖山勝概〉一節「眞珠園」條下注曰：「有眞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今歸張循王（即張俊）府。」（註189）眞珠園原來是皇帝的園，其豪華可想而知。至於「玉壺園」，《武林舊事》載有皇家的「玉壺園」，在錢塘門外，而《夢梁錄》則提到「普提寺後謝府玉壺園」。（註190）「艤舟於玉壺園而竟席」句，不知究竟指那一園。無論如何，能夠在華麗的貴族花園裡散步、飲宴，一定是非常難得的機會與榮幸。當然，遊西湖才是當天最主要的活動。文及翁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寫下了那首〈賀新郎〉的。因此這一段也就與卷一的〈遊湖詞〉那條首尾遙遙相照應了。無庸置疑，湖山歌舞是《錢塘遺事》一書所批評的中心主題，雖然書裡並沒有太多直接的記述或討論該主題的文字。

文及翁只在《錢塘遺事》裡被提到過兩次：第一次在卷一〈遊湖詞〉條，第二次在卷七〈朝臣宵遁〉條。前後兩條所代表的是迥不相同的人。前者是從內地來首都臨安的剛及第新進士；他在新進士遊湖時所賦的詞，充分表現其抱負、其對於國家前途的憂慮、以及其對於南宋事無可爲的情況所體會到的無可奈何之感。後者則是朝廷裡執政高官之一，於元兵逼近京城的時候逃遁。劉一清並未對後面這位文及翁給與任何批評。也許這是因爲他認爲，文及翁也是他自己詞裡所攻擊的湖山歌舞文化現象的受害者之一。

除第九、十兩卷外，劉一清也採錄了許多屬於傳聞性質的材料，與可信的史事記載穿雜在一起，使人對該書的歷史性不能不產生懷疑。前已述及，《提要》曾經批評劉一清引錄材料時，既不注明出處，也不改變原始資料作者的口氣，「遂使相隔七、八十年，語如目睹」。（註191）看似尤其荒唐的是，劉一清初用宋人語稱元爲北兵、北朝，可是當元兵下江州、下安慶、入臨安時，又改用元人語而稱大元、和大兵。《提要》解釋此怪現象說：「蓋雜采舊文，合爲一帙，故內外之詞，不能畫一，亦皆失於改正」。（註192）問題是，劉一清廣採說部舊文時，也常改變其語句，或加入按語，以配合自己編撰《錢塘遺事》的主旨。他之不改正引用書裡敘述者

189. 吳自牧，《夢梁錄》，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410。

190. 吳自牧，《夢梁錄》，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391及296。

191.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頁21-22。。

192.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頁21-22。。

的口氣 (narrator's voice)，是否不是一時之疏失，反而倒是故意安排的書寫策略呢？也許他正是要讀者看他所編撰的《錢塘遺事》時，有「如目睹」的感覺。《提要》全從「史料」的觀點來看待《錢塘遺事》，因此其評論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從傳聞與史事夾雜的現象、大量詩詞的引用、伏筆、和照應等藝術手法的運用來看，《錢塘遺事》的文學性非常強烈。換句話說，劉一清雖然是宋遺民，可是他在《錢塘遺事》中所採用的口吻卻不局限於宋遺民，而更像是一個不偏不倚的觀察者 (disinterested observer)。其實，文及翁雖然在〈賀新郎〉詞中用「余」字，此「余」也應該作不偏不倚的觀察者來看待。二十世紀加拿大文論大師諾索普·福萊 (Northrop Frye, 1912-1991) 曾說過，當我們在欣賞或批評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現在正處理的，是想像的——而非實際存在的——東西，是『認此為真實的』——而不是『此即真實的』——東西。」(註 193) 《錢塘遺事》雖然除了很多可信度不高的傳聞逸事外，也採錄了不少有關史事的記錄，可是其總體架構基本上是文學性的。因而，此書內容雖然不全是想像的，整部書卻應該當作文學作品來閱讀和欣賞。與《錢塘遺事》比較，前面討論過的文及翁的〈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則是一篇「此即事實」的記載，是記載在「事無可為」的宋末政治社會環境裡一位有志之士的生平傳記。後者是歷史性的記述，而前者則是文學性的編撰。因此，我們看《錢塘遺事》和錄於其內的文及翁的遊湖詞時，就不能採用讀歷史的態度，而要採用閱讀憑藉想像所構設出來的文學作品的態度。

劉一清雜采舊文的目的是要撰寫一部關於南宋自建都於臨安到滅亡於元的歷史故事。但他把南宋的失敗統統歸罪於上層階級的沉溺於湖山歌舞以至於置天下事於度外這一主題。事實上，南宋之滅亡於蒙古人手裡，其原因是極為複雜而又多方面的，非湖山歌舞一事所能完全解釋。然而，與純粹歷史著作比較，文學作品有其特別感人的魅力。《錢塘遺事》所提出的對於南宋滅亡的解析，給後來在中國傳統裡有關南宋歷史的看法，起了一定的影響。例如，清朝乾隆皇帝看了此書

193. 這是 Graham Nicol Forst 引自福萊所著 *The Well-Tempered Critic* 的話：“We are now dealing with the imaginative, not the existential, with ‘let this be,’ not with ‘this is.’” 見 Graham Nicol Forst, “Kant and Frye on the Critical Path,” in Jean O’Grady, and Wang Ning eds., *Northrop Frye: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3), pp. 23-24。

後寫了兩首詩，其中之一如下：（註 194）

失策明題去建康，卻耽山水便都杭。
湖邊歌舞酣餘樂，天外徽欽棄遠荒。
八帝歷年纔百五，多奸少正致淪亡。
翻書千古垂殷鑒，漫例飛鴻徒號堂。

乾隆這首詩前六句，可說把《錢塘遺事》整部書的大意，很簡明扼要地提出來了。從詩之第七句，我們可以看出他同意也重視劉一清對於南宋歷史和文化的批評。乾隆的「湖邊歌舞酣餘樂」和「多奸少正致淪亡」兩句，可說是劉氏提供的南宋敗亡原因分析的一個概要。我們也可說，文及翁早在宋亡前二十幾年就已經有國家必亡的預感了，而他的預感也主要是來自對於君臣之耽溺歌舞與志士不見用等現象的。應該強調提出的是，後來流行的對於南宋滅亡的通俗看法與文、劉兩氏觀點一致。在此我且舉現代人劉鄂公所著的《說南宋》來作例子以結束本文。

劉鄂公在其〈自序〉裡說：「筆者去夏旅港，自坊間搜集南宋一代之稗官野史諸家筆記類鈔實錄等數十種。歸後以正史爲經，以野史爲緯，摘要分類，筆爲一文，題曰：『說南宋』」。（註 195）根據他自己的記述，劉氏所搜集的材料以野史筆記爲多。《說南宋》共分六十章，其中有四十五、六章都是在說高宗在位時候的情形。此書的重點與《錢塘遺事》完全不同。劉鄂公看過《錢塘遺事》否，不得而知。書中引用過《古杭雜記》和《宋稗類鈔》，因此他可能看過文及翁的〈賀新郎〉，可是他並未提及此詞。劉鄂公對於南宋敗亡的看法可以如下兩段作代表：

南宋遭靖康之難，偏安江左，歷年一百五十一，歷君八九，其間名將賢相輩出，慷慨悲歌忠義有為之士，尤不乏其人，……但自播遷臨安以後，從廟堂以至山林，憑恃兩河（即淮河與長江）天險，一隅自安，粉飾太平，不獨未能北定中原掃穴犁庭，且因人謀不臧，終致君臣流亡，浮尸海上。所謂中興難，偏安尤難。（註 196）

194. 《欽定四庫全書·錢塘遺事·御製題錢塘遺事》，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詩後有注曰：「是書爲汪啓淑飛鴻堂所藏，因假備用目送飛鴻事」，以之來說明詩之最後一句。

195. 劉鄂公，《說南宋》（臺北：平原出版社，1965），頁 2。

196. 劉鄂公，《說南宋》，頁 1。

……南宋自紹興元年（1131）以後，君臣上下，都以「中興」為口號，相互沉湎於聲色犬馬酣歌樂舞之中，此所以偏安半壁，局促一隅，終至於崖山淪亡……（註 197）

雖然劉鄂公沒引文及翁詞和《錢塘遺事》，而我們也不能確定他是否看過此兩篇文學作品，可是他用以解釋南宋衰亡的原因，與文、劉兩位宋遺民的看法，竟如出一轍。文及翁詞，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其特殊意義，就是因為它用精美的詩歌語言，表達他對南宋國事的看法，而那看法在後世廣為人所共用。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古杭雜記詩集》，明鈔本顯微膠片，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學亞洲圖書館。
- 《辭源》，北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文及翁，《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收於嚴靈峰主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 ，〈朱公墓碑記〉，收於清劉澹修，潘宅仁纂，《孝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152-1156。
- ，〈傳貽書院記〉，見徐碩，《至元嘉禾志》，卷 25，收入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 ，〈慈湖書院記〉，見袁桷（1266-1327），《延祐四明志》，卷 14，收入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 *——，〈故侍讀尚書方公（逢辰）墓誌銘〉，見《蛟峰文集、外集》，卷 3，收入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 文天祥著，熊飛、漆身起、黃順將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 王十朋，《東坡詩集註》，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上海：中華書局，1958。
- 白 珽，《湛淵靜語》，收於清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第九集》，上海：古書流通處，1921。
- 朱 熹，《四書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9。
- ，《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 呂 中，《宋大事記講義》，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197. 劉鄂公，《說南宋》，頁 39。

- 沈季友，《櫟李詩繫》，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 紀昀等纂，《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4。
- 岳珂，《桎史》，收入王雲五編，《四部叢刊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周密，《武林舊事》，收於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 外四種》，上海：中華書局，1962。
- ，朱菊如、段颺、潘雨廷、李德清校注，《齊東野語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 吳澄，《吳文正集、附錄》，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周應元，《景定建康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姚勉，《雪坡集》，收入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高斯得，《恥堂存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5。
- 徐碩，《至元嘉禾志》，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 張之翰，《西巖集》，收於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張岱著，孫家遂校注，《西湖夢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
- 陸心源，《宋史翼》，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陸楫，《古今說海》，臺北：廣文書局，1968。
- 陶宗儀，《說郛》，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脫脫等修，《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陳著，《本堂集》，收於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 陳夢雷編撰，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電子版，臺北：聯合百科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 陳騭、佚名撰，《南宋館閣錄、續錄》，張富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
- 無名氏，《宋史全文》，收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無名氏，《宋季三朝政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8。
- 趙升，《朝野類要》，收於王雲五編，《叢書集成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9。
- * 劉一清，《錢塘遺事》，景印嘉慶（1796-1820）洞庭掃葉山房席氏校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蔣正子，《山房隨筆》，收於《癸辛雜識、外八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收於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魏天應編，《論學繩尺》，收於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二、近人論著

- 王筱芸，《增訂注釋全宋詞、第四卷》，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戴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 * 林順夫，〈南宋長調詞中的空間邏輯——試讀吳文英的《鶯啼序》〉，收於張宏生譯，《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附錄2，頁190-209。
- 胡雲翼，《唐宋词一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 高友工，〈小令在詩傳統中的地位〉，收入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8，頁265-283。
- * 唐圭璋主編，《唐宋词鑒賞辭典》，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編，《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73。

夏承燾，〈文及翁的西湖詞〉，《浙江日報》（杭州），1962年2月28日。

* 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 許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成都：巴蜀書社，1986。

張 亨，〈《論語》中的一首詩〉，收於《思文之際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469-495。

* 傅增湘纂輯，《宋代蜀文輯存》，香港：龍門書店，1943初版，1971影印。

劉鄂公，《說南宋》，臺北：平原出版社，1965。

Franke, Herbert. "Chia Ssu-tao (1213-1275): A 'Bad Last Minister'?",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nis C.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17-234.

Forst, Graham Nicol. "Kant and Frye on the Critical Path," in Jean O'Grady, and Wang Ning eds. *Northrop Frye: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3, pp. 23-24.

Hucker, Charles O..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Mote, Frederick W..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Fu, Tseng-Hsiang, Ed. *Songtai shuwen jicun (Collected Extant Writings by Szechwan Authors of the Song Dynasty)*. Hong Kong: Lungmen shudien, 1943 1st edition, 1971 Facsimile Edition.
- Guhangzhou Zaji Shiji (*Miscellaneous Records of Old Hangzhou: A Collection of Poems*). A microfilm in the collection of As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 S. A.
- Ho, Chung-Li and Hsü Chi-Chün. *Nan-Song shigao (A Draft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ong)*. Hangzhou: 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1999.
- Kao, Yu-Kung. "Xiaoling zai shi chuantongzhong de diwei (The Place of the Short Song Lyric in the Tradition of Shi Poetry)." In Kao, Yu-Kung. *Mei-dien: Zhong-guo wenxue yan-jiu lunji (Aesthetics: Studi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p. 265-283.
- Lin, Shuen-Fu. "Nan-Song changdiaoci-tz'u zhong de kongjian luoji—Shidu Wu Wen-Ying de 'yingti xu' (Space-Logic in the Long Song Lyrics of the Southern Song: Reading Wu Wen-Ying's 'Prelude to the Oriole's Song')." In Chang, Hong-sheng, trans. *Zhongguo Suqing Chuantong de Zhuangbian-Jiangkui yu nansongci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Jiang Kui and Southern Song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05, Appendix 2, pp. 190-209.
- Liu, I-Ch'ing. *Xiantang Yishi (Past Events of Xianta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85. This is a facsimile of Mr. His's coll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Dongting Saoye shanfang during the Jiaqing Reign Period (1796-1820).
- T'ang, Kuei-Chang. ed. *Tangsongci Jianshang Cidian (A Dictionary of Appreciation of T'ang and Sung Song Lyrics)*. Shanghai: Jiansu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86.
- T'ao, Er-Fu and Liu Ching-Ch'i. *Nan-Song Cishi (A History of Southern Sung Song Lyrics)*.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T'ien, Ju-Ch'eng. *Xihu youlan zhiyu (A Supplement to Records of Sightseeing on West Lake)*.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 Wen, Ji-Weng. "Gu shidu shangshu Fang kong [Feng-Chen] muzhiming (An Epitaph for the Late Reader-in-Waiting Minister Fang Feng-Chen). See Jiaofeng wenji waiji, Vol. 3. In Wang, Yun-Wu, ed. *Qinding Shikuquanshu zhenben Sij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in Four Categories Made by Imperial Order, the Fourth Part)*.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6.

Wen Jiweng of the Late Southern Song: The Man, His Life, and His Poem *West Lake*

Shuen-fu Lin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BSTRACT

The poem *West Lake*, set to the tune of “Ho Hsin Lang” (“Congratulating the Bridegroom”) and attributed to Wen Jiweng of the late Southern Song (1127–1279), has been read with admiration by critics and ordinary people alike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However, this poem has never been thoroughly studi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remarkable poem and its probable author’s career in order to fill this lacuna in scholarship. It begin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oem’s composition and circulation as recorded in available manuscripts. It then extends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an Wen Jiweng: his career, his learning, and his extant writings.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paper presents a close reading of the poem with an eye to all of the historical allusions and the artistic features found in the text. The last section of the paper explores the theme of the fall of the Southern Song, caused by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pleasure among the elite and well-to-do urban dwellers. The expression of this theme as a prediction of the downfall of the dynasty has won Wen Jiweng a signific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Song poetry and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Wen Jiweng, poem of *West Lake*, Late Southern Song, cultural criticism

(收稿日期：2008.5.14；修正稿日期：2008.10.3；通過刊登日期：2008.10.23)